

# 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

## ——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 乾嘉情懷及其意義

蔡長林

### 提 要

李慈銘因《越縵堂日記》而於晚清享有盛譽，是書評騭經史百子之斷語，洋洋乎百萬言。後人震懾於其賅博宏富，多以《日記》所書之文而溯源李氏之學，或以其論學林高下之語而述清季學術。但此類論述，並未能直陳隱沒在學術論斷之後的終極關懷。是以本文透過爬梳《日記》中的言論，探討李氏在進行學術批判時的準繩，乃是以乾嘉漢學傳統為典範；通過對學人、著述之臧否是非，試圖扭轉學術之歪曲，以冀重建已然頹圮的漢學宮牆，重返心中那個學術、政治皆足垂範的乾嘉時代，也依此闡明傳統士人力圖斧正學術而醇厚風俗的理想追求。

**關鍵詞：**李慈銘 《越縵堂日記》 乾嘉漢學 學術價值觀

### 一、前 言

以洋洋數百萬言《越縵堂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在晚清享有大名的李慈銘（1829—1895），其實並未得到後人充分的理

解與認識。這樣的說法,倒不是認為李慈銘其人其學未曾引起過注意,也不是認為李慈銘的利祿之心與善罵之名應當洗刷,更不是認為李慈銘迷戀歌郎積廢不經的晚清士大夫形象需要為之避諱。而是認為,對於上述負面形象的過度渲染,使得潛藏在李氏內心之中的學術情懷與精神寄託,往往為此表象所遮掩,以故對其論學脈絡之掌握與人格清濁之認知,也就仍處在渾沌之際,尚未有細緻之分析。換言之,學界對李慈銘的理解與評價,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到位。當然,倒不是說先行的研究,除了在知識層面對李慈銘的學問文章進行討論之外,未曾有過這方面的探索,但所論或對李氏缺乏溫情與敬意,或是淺嘗即止<sup>[1]</sup>。所以,對於李慈銘的學術情懷與精神寄託,似仍有探討之餘地。而且個人以為這方面的探討,是理解李慈銘其人其學最關鍵之處。

或許由於《清史稿》將李慈銘歸於《文苑傳》而非《儒林傳》的緣故,注意李慈銘學術成就的人不多,這方面的研究,總的來說較為薄弱,評價也不高。例如錢穆即批評李慈銘“徘徊漢宋,出入經史,博而無統,雜而寡要”<sup>[2]</sup>,顯然是認為不足以當著作之林。劉禹生批評李慈銘,以為:“不過本其經史百家詩文之學,號召同儕。至於體國經野、中外形勢、國家大政,則所知有限,實一純粹讀書之儒。卻又不能守其所長,乃以己見,侈談故事,宜香濤(張之洞)諸人不敢親近。”<sup>[3]</sup>這樣的評論倒也離題不遠,畢竟政治領域上的揮灑折衝,並非李慈銘之所長,李氏也因屢困棘園之故,終身未得所遇。但是,劉禹生的批評並沒有意識到,潛藏在李慈銘心中的那種欲以重建學術規範來廓清政治秩序的急迫之感。其實,體現在李慈銘嘻笑怒罵諸般文字背後的,是傳統士大夫蒿日時艱的痛苦情狀。他心中充滿的是長日將盡之歎,是科舉掄材不當,造成學術失範、政治污染、世運日晦的無奈之感。從他的治學目的與自我設定的位階來看,既非意在引領一代學術之運以開風氣之先,當然也沒有體國經野,學兼中西的能耐。我們應當關注李慈銘的也不該是在這一方面,否則就

會像某些評論一般，以未能有現代化意識批判李慈銘，令人感到怪異<sup>[4]</sup>。

另外，汪辟疆說：“越縵喜談經學，實非所長。一生學術，乃在乙部。批閱諸史，丹黃滿帙。”<sup>[5]</sup>亦即肯定他的史學而否定他的經學。至於費行簡（沃丘仲子）與張舜徽，則對李慈銘有最嚴厲之批評。如費氏認為李慈銘“治經僅習訓詁，漢人家法絕無所知；治史徒能方人比事，不識源流體例。嘗觀所為《日記》，動詆人俗學，不知己學亦非甚雅也”<sup>[6]</sup>。張舜徽則批評李氏自道所學，謂平生所不忍自棄者有二：一則喜觀史；一則性不喜說部，實乃自文之辭。張氏謂觀李氏平日涉覽，全在宋、元、明人說部書，經史俱非所長，於經學尤荒蕪。又批評他於樸學家堅苦寂寞之功，無能為役。故《清史稿》置之《文苑傳》末，實為平允<sup>[7]</sup>。按繆荃孫曾言：“越縵於經學、小學未有著述，似難列於《儒林》。……若列入《文苑》，尚可為後勁，廁之《儒林》，黯然無色矣。”<sup>[8]</sup>蓋以李氏無經學、小學之專門著述，而詩文尚有可觀，足為後勁，以故將李慈銘納入《文苑傳》。這樣的標準倒是無可厚非，卻不見得能夠真實反映出李慈銘客觀的學術水平來，必有仁智之見<sup>[9]</sup>。至於認為李慈銘長於史短於經，抑或認為李氏經史俱非所長，於經學尤荒蕪，這樣的評價，以今日眼光來看，其實還有許多探討的空間。

首先，不論是李慈銘的經學抑或史學，都帶有濃厚的乾嘉學術印記。在我看來，此一學術印記有其特殊之義蘊，不宜僅僅視為李氏“細針密縷，比較鉤稽”<sup>[10]</sup>的學術表現風格而輕易帶過，還要看到這是李氏衡量興衰治亂、是非善惡的準繩。換言之，只注重其史學而不關注其經學，將無法充分展現李慈銘論學背後的學術情懷。其次，即使身後不足以廁身儒林，並不表示李慈銘的學術就無探討之意義。先且不談深受漢學考據影響的李慈銘，對文字、訓詁、校勘、目錄、版本、金石諸學均有心得，值得為文專門介紹。吾人更須在意的是，著述與評論之區別。二者之

關係正如同作家與批評家之間,即使無法成為作家,不代表無法成為批評家。同樣的,李氏縱不足以躋身儒林之列,然其學術評論,乃為本色當行。《清史稿》在這方面也是不吝贊揚,如言:“(慈銘)日有課記,每讀一書,必求其所蓄之深淺、致力之先後而評騭之,務得其當,後進翕然大服。”<sup>[11]</sup>又如金梁所言:“越縵所記,多當時學術動態及評騭,關係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學術思想傾向,為翁、王、葉諸家所未備,有裨研治近百年中國學術思想史者之參考採摭。”<sup>[12]</sup>《清史稿》與金梁之言,已充分指出李氏《日記》價值之所在。更何況其評騭點勘,亦有過人之處。李文糾即言:“(《日記》)考據精詳,綜合名實,議論賅博,引證宏富,仿之亭林《日錄》、滌生《日課》,有過之無不及也。”<sup>[13]</sup>王存訓則稱李慈銘:“每讀一書,撮其指意。鈎元契領,採擷其英華;起廢箴育,糾繩其謬誤。略如《四庫全書提要》之例,而詳贍過之。”<sup>[14]</sup>蔡冠洛亦云:“清同、光間士大夫,承乾嘉餘緒,竟以漢學相尚。越縵老人流寓京師,翱翔其間,其才氣之盛,考核之精,並世無兩。”<sup>[15]</sup>而楊樹達更是極力推崇李慈銘,以為:“越縵先生者,乃承錢(大昕)、洪(頤煊)之流,而為有清一代之後殿者也。”<sup>[16]</sup>並且認為:“後人治史,若捨先哲遺留之田土置之不耕,徒鹵莽滅裂,乞靈於外人,於學固無所得,而其有一愧於錢、洪、王、趙及越縵諸先生亦已甚矣。”<sup>[17]</sup>換言之,李慈銘雖無足夠分量的經史撰著,但是他留在《日記》中大量的讀書劄記,對於研究古籍及治學術史者往往富有啓迪教益之功,其價值亦堪敬陪乾嘉先哲之後。此諸家之評論,想亦足以彌補其沒有躋身《清史稿·儒林傳》之憾。

但是,這樣的評價,尚不足以體現出李慈銘治學精神之核心。既然李慈銘論學以乾嘉為式,那麼在論述之際,會帶有什麼樣的關懷?是僅就學術而論學術,抑或是藉評騭學術而別有寄託?這一點其實學界至今,尚未有系統的討論。但是只要細讀李氏《日記》就不難發現,字裏行間的寄託之意,其實俯拾皆是。

更重要的是，這種以乾嘉爲式的立場所展現出的學術情懷乃至精神寄託，對李氏本人有何意義？而其精粗之間，又有何出彩之處？這一點，更是理解作爲一個傳統士大夫的李慈銘，最關鍵之處。舉個相近的例子，身爲文化遺民，陳寅恪對外患日亟、國運日蹙的同治、光緒時期，還會寫下“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sup>[18]</sup>的詩句爲之詠歎。許多新派人物，如胡適等人便對此感到不解。如今看來，這其實不難理解，這種對舊時代的追憶，其實是在身處新時代的不適應的情況下，所營造出來的對於過往出以無限美好想像的文化情懷與精神寄託。就好像歷經大革命之後的法國人，對路易十四時代充滿了追憶與贊歎一樣。同樣的，即使未曾面臨改朝換代之痛，但對於親歷太平天國戰亂，又經過無數次科場失敗，以及目睹晚清官場與學術敗壞而怨懣叢生的李慈銘而言，他的乾嘉情懷，其實就是一種對過往時代的美好想像，也是一種對盛世時光的追憶，更是一種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後的精神寄託。所謂“周召沒而王迹衰，幽厲作而風雅變”<sup>[19]</sup>，然則頌周召即所以刺幽厲也。

但由此我們更須明白的是，爲何李氏將情懷寄託於乾嘉？其實李氏寄託於乾嘉的情懷，其間透露出的，還是傳統讀書人根深蒂固的經學政治觀。套用他的好朋友張之洞的話來講，就是：“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sup>[20]</sup>須知傳統學者，即使是乾嘉諸大師，在主觀上也不僅只是把學問當作知識對象來看待，而是寓有更深層次的價值規範。他們對某些學術形態的歸宗（例如漢學），或是對某種學風的批判（例如宋學），其實都隱藏有很深的以純化學術從而達到純化政治的儒者關懷，此即所謂轉移風氣者也。而不僅僅是停留在方法學層次上，宣揚自己實事求是的學術主張而已。更何況對李慈銘而言，他的乾嘉情懷，絕非僅僅落實在追求客觀化與去道德化這一做學問的方法學層次上。更具有鮮明色彩的，是他的乾嘉情懷，是他用以衡量學術、政治、文章、風俗人心乃至整個人文傳統美惡之

標準<sup>[21]</sup>。而其出發點,除了學術關乎世運這一傳統思維在其靈魂深處發酵之外,他依稀的童年記憶裏,也曾短暫浸染過盛世的流風餘蘊,這些美好的回憶與感受,讓他終其一生,念念不忘,而於《日記》之中,深情追憶,款款流露。

換言之,作為一個泛覽經史、嫻熟詩文的傳統讀書人,在追撫往昔,痛感當下的同時,李慈銘自然而然地會以一個文化人的角度,將一切對盛世的美好想像,化約成一種對乾嘉學術的追隨與護持的心情。這不但表現在他對盛世文章的緬懷之中,也表現在對所處學術文化環境惡劣的批判裏。於是維護鄭玄、褒美乾嘉、痛批道咸以降學術失範之表述,不斷出現在其文字之中。而這一承平與板蕩、盛世與亂世的對照,又與李氏對學術優劣的判準相重疊。從這個角度來看,對盛世文章充滿贊歎之情的李慈銘,就算在《儒林傳》排不上號,也無愧於身處護持傳統學術文化的士大夫之列。所以,必須先掌握李慈銘歸宗乾嘉的用心所在,從中發掘李慈銘的學術靈魂,亦即其價值理想寄託之所在,才能對他的學術評論有更深層次的理解與評價;否則李慈銘的形象,終不過是一個縱情聲色、脾氣古怪的狂生罷了,而其豐富的論學所得,終究亦不過是作為吾人討論傳統學術時,借以佐證持論的素材而已。

## 二、對盛世文章的緬懷

在李慈銘的文字敘述裏,經常會看到他對過往美好的幽思緬懷,相對的也常看到他對世道人心之不滿與批判。潛藏在緬懷與批判這兩極化情緒背後的,是他對重建秩序的渴望。而這種渴望重建的秩序,並不是風調雨順、百姓安居這樣的庶民情調,而是一個知識人、文化人對承平土壤培養出的盛世文章之渴望,以及欲以學術挽世運的悲願。先來看一段李氏的日記:

夜就叔子卧室閑話，因及承平時家園之樂。先世雖皆以勤儉治生，然食德服疇，宇內殷樂，故暇必聚鄰里親戚，過從飲食，以次治具，歌詠嬉遊，兒時猶及見之。今三十年，天下遂已至此。我生不辰，謂之何哉！平世士夫，亦間尚風流，而不以刻意詩歌爲事，亦無裙履之飾、絲竹之好。信然而作，信然而輟，其吐屬皆得中和之音。雖不以詞藝名，而太平之象，藉之以見。（咸豐十年七月二十八）

所謂的食德服疇，簡單講就是繼承遺澤舊德，耕作先人田疇。換言之，就是一個維持家風的“世家”形象。當其時，宇內殷樂，里黨之間，過從飲食之際，必有歌詠風流之雅；而其間絲竹吐屬，亦盡有宮商中和之音。此蓋乾嘉承平之縮影，然沾溉所及，連道光初年尚在垂髫的李慈銘，都對此風流餘韻，印象深刻。須知這種盛世文章，不只是表現在吐屬中和的詩酒風流上，其內在更有精博邃密的學術力量以爲支持。因爲當其時，“老師宿儒巍然負文望者尚十數公，讀書爲秀孝者猶十而八九，其學皆足潤一身，其行皆足式一鄉”<sup>[22]</sup>。其意蓋謂風俗之美，導因於學術之醇。可惜不過三十年，天下遂已至此，故有“我生不辰，謂之何哉”之歎。但我們卻不宜將李氏這番我生不辰的感慨，僅定格在對戰亂後的破敗景象作情感抒發，還要看到的是李氏對盛世文章消散的慨歎，他遺憾於自己未曾生活在乾嘉的經術文章所構築成的盛世裏。再來看另一段記載：

吾邑楊六士（夢符）先生《心止居集》，爲古今體詩四卷，雜體文二卷。先生世家邑之安城鄉，爲大瓢先生（楊賓）從孫，僑居毗陵，久宦京輦，際乾嘉之盛，與一時魁傑角逐藝事，飛騰觴詠，其詩文皆雅雋麗則，有先民典型，孫（星衍）、洪（亮吉）諸君子言之詳矣。先生……中子揆爲張茗柯（惠言）高第弟子，勤袍遺書，斐然有作。……余自歲在甲申，主講問津書院，有楊生鳳藻……以此書及大瓢先生

《柳邊紀略》稿本來謁，始知生爲子揆之孫，孑身僅存，家徒壁立。先生兩世所著，僅此二冊，弊紙破爛，版已久亡，余爲整理完之。吾越故家文獻衰落，摩挲此冊，片楮零縑，彌可寶貴，略言其概，俾後有考焉。光緒辛卯正月會稽李慈銘識於京邸軒翠舫。<sup>[23]</sup>

從這一段文字裏，我們再次看到李慈銘對際乎乾嘉之盛，懷有的特殊情緒。文字中隱隱透顯出的，是他對故鄉前輩身處盛世，能與乾嘉諸君子角逐藝事，飛騰觴詠的羨慕之情，同時也是對文學故家凋零，鄉邦文獻衰落的感慨。再來看一段他對王煦的《小爾雅疏》撰寫的《題詞》，其言云：

先君子嘗謂吾越有二《雅》之學，邵二雲氏《爾雅正義》、王汾原氏《小爾雅疏》也。……王氏所著，尚有《說文五翼》及詩文集數種。……予謂邵氏及郝蘭皋氏之《爾雅》、王氏之《廣雅》與先生此書，皆文義淵藪，曠古絕今，可援漢文帝立《爾雅》博士例，置於學官，爲國朝四《雅》之學。……予己未歲入都，行篋僅攜先生《說文五翼》一種，爲賊奴竊去，惋悵曩日。嗣遍閱廠肆，又於同鄉旅寓各處訪求，竟無從得。今年館商城相國（周祖培）家，同允臣比部偶過市，覲此書，時行滕僅京錢兩緡，即舉付購歸，如獲異寶。回首故鄉，已爲盜窟，家毀於火，插架所有，盡成灰燼，此板亦當付巨劫決矣。鑿楹莫保，庭訓墜地，對之泫然。同治壬戌四月，李慈銘識。<sup>[24]</sup>

按此則記載，既是他對乾嘉時代《爾雅》之學的最高禮贊，同時懷有追憶庭訓，傷家園劫火之痛的戚然之情。在他看來，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以及王煦的《小爾雅疏》，都是文義淵藪，曠古絕今，代表當時《爾雅》之學的最高水平。他呼籲可援漢文帝立《爾雅》博士例，置於學官，爲國朝四《雅》之學。值得玩味的是，他對《說文五



翼》失而再得的敘述，在懷舊情緒之下，還帶有家園劫火，斯文燼滅的濃濃感傷。真可謂長日將盡，典型夙昔。盛世一去不返，徒留遺澤供後人憑吊。

必須指出的是，李慈銘之所以會有如上述之緬懷，與其知識養成過程中，長期浸染在乾嘉前輩的著作裏有關係。在《復桂浩亭書》裏，李氏感慨自己其生也晚，吳越經師已奄化，當時的擁比設帳者，多不讀注疏，使他擣味之質，遂無自啓。“迨得讀《學海堂經解》，始知經義中有宏深美奧，探索不窮如此者，遂稍稍讀甲部書。自漢及明，粗得崖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sup>[25]</sup>其意蓋感慨乾嘉經師所塑造出的學術與知識氛圍，在李慈銘青少年時代的紹興，已不復及見。換言之，對乾嘉學術的喜愛與浸淫，主要是來自於閱讀與自學，而非來自於師承與傳授。正因為自以為較同儕乃至當時的專重科舉八股的讀書士子有更高層次的視野，所以他會在《日記》中對在任學政周玉麒頗致鄙薄之意，也不是難以理解之事<sup>[26]</sup>。

值得一提的是，李慈銘在應秀才試的階段，接連受到主考官的提拔。道光三十年的院試，以及咸豐元年的科試<sup>[27]</sup>，主考官都是當時的浙江學政，著名的漢學家吳鍾駿（姓舫）<sup>[28]</sup>。吳氏對於李慈銘的詩文評價甚高，對其闈卷批詞云：“首場風華掩映，法密詞圓，詩文俱稱。覆試貫上語脈，醒出正意，濃淡相間，心細手和。經藝珠圓玉潤，詩秀雅。古學筆意，如走盤珠，盤旋如意。”（咸豐甲寅三月十四）<sup>[29]</sup>這裏所說的“古學”倒不是指考古之學或經學中今文與古文之分的古學，乃是針對八股文而言，凡不屬於八股的學問，諸如經解、史論和詩賦等，概稱古學。<sup>[30]</sup>誠如學者所言，李慈銘的讀書方向，與其時士子競研制藝以博高第的情狀，似乎大相逕庭。這與李慈銘連考三次纔中秀才，這種考運奇舛的遭遇有極密切關係<sup>[31]</sup>。所以李氏對於吳鍾駿的慧眼獨識頗有感激之情，時過十年之後，仍認為其稍知向學，實源於此<sup>[32]</sup>。

離家赴京,是李慈銘一生的重要轉折。他治學道路的確定,也是從此時開始。從《日記》可以看出來,李氏在赴京之初,購得一批經學著作,尤其著重《說文》之學。咸豐十年(1860)正月十三日立春,是日《日記》云:“買得段玉裁《說文》四帙,比年覓此,今日始得,可喜也。”<sup>[33]</sup>其間還買了王鳴盛的《尚書後案》、汪中的《述學》、孔廣森的《儀鄭堂文》以及練恕的《多識錄》等<sup>[34]</sup>。換言之,李氏至京師之後,在學問的興趣上有一大轉變,對經學尤其是字學大感興趣。觀其所買所閱,除了一直感興趣的文史之學外,還增加了一大批乾嘉前輩的著作。如《說文》段注、《經義述聞》、《禹貢注》、《公羊通義》、《大戴禮補注》、《鍾山劄記》、《龍城劄記》、《十駕齋養新錄》、《廿二史考異》等,這些都是經學、史學方面訓詁考訂的大家之作。同時,入都之後的李慈銘,也交往了一批喜談經學、已有著述的士人,如素喜小學的謝增。正如盧敦基所言:“總的來說,李慈銘的學術理念到京師後開始定型。按照宏大叙事,京師此時開始主張漢宋兼採,但是李慈銘接觸到的還是以漢學為主的理念,所以他到了京師後反而更執著於漢學。”<sup>[35]</sup>換言之,李慈銘生平學術路向在青壯年時期業已定型,此後不管談經論史,其學術觀皆未有重大轉變,一貫維持著漢學的價值觀與方法論。

問題在於,李慈銘並非純粹的經師或學者,他也是眾多的科舉士子之一。他雖然對於漢學有極高的興趣,也認同這樣的學問纔是讀書人所應追求的目標,更是對於自己的學術選擇充滿了自信,認為這纔是盛世承平的正學雅音;但現實的情況卻是,他的功名之路必須經過科舉之角鬥。然而此時的科舉風氣,從主持試場的考官到試卷的內容到絕大部分的應試士子,又重新充斥著程朱理學的認同者與追隨者的聲音。同情漢學者,如朱筠、朱珪兄弟,謝墉,阮元,程恩澤,何紹基,吳鍾駿等能在朝堂與地方上掌握科舉話語權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sup>[36]</sup>。認同漢學的李慈銘,也就注定是科舉場上的常敗之軍。對於科場之文之學,

李慈銘向來未有好話頭。他常以鄙視的口吻痛批此一朝廷功令，認為只會下喪其真而上受其弊。如言：

嘗慨近世既以至庸極陋之文取士，相沿成格，莫敢變議，其不能得人亦夫！……宜若可以得人，而何以所舉者率多鄙詭險污，備名實而不顧？……下喪其真，而上受其弊，此論世者所為太息而不已也。<sup>[37]</sup>

但我們卻不宜簡單地只把李慈銘對科舉的批評，看作是他個人的失敗之怨。李慈銘的怨懟或許過於激烈，李慈銘的批評或許過於苛刻，但他的出發點更多的是學術良窳關乎世運的憂慮，是舉世滔滔斯文無與的寂寞，否則也不會說“此論世者所為太息而不已”了。在寫給馬新貽的信裏，李慈銘如此提到：

慈一生酷好，惟在文章。十載以來，稍研經史。深慨近時人士漸不讀書，科名之外，無復事業。父兄以是為教，子弟以是為學。五經本文，鮮能誦習。浮華相尚，剽襲爭能；學術人心，末由自正。釀斯寇禍，非為無因。<sup>[38]</sup>

“科名之外，無復事業”，“學術人心，末由自正”，這是一灘無源死水。原因無他，“士人漸不讀書，五經鮮能誦習”。他甚至把招致太平天國之亂的原因，歸咎於經史之學的淪喪，使學術浮華，人心偷薄而釀斯寇禍。所以我們當知，李慈銘在緬懷承平美好時光的同時，所作出的“天下遂已至此”之歎，指的不只是戰亂之後的殘破凋敝，更是人心日偷、學術日窳的末日景象。簡言之，就是一種整體的文化淪喪。來看一段紀念好友陳德夫的文字：

嗟乎！自國家以繩墨資格取天下士，士之魁桀岸異者，概不得自見。率佻佻倪倪就裁抑，以冀一當。於是文章經術、氣節德性，屏絕弗講，而惟剽襲模擬，千喙一聲，挾庸惡之講章，腐爛之程藝，以求所謂進士之一科，故人才益衰，馴

致大亂。亂亟求才，而才益不出，有司之守繩墨資格益甚。以予生四十年，出而交天下士，蓋無論或遇或不遇，皆蒙然張口，如坐雲霧，或習爲妄言，欺世取名，求其慨然有志于文章經術、氣節德行者，無有也已。<sup>[39]</sup>

按陳德夫可以說是李慈銘一生之摯友，兩人性情相投，遭際相類，都是故家中落，以貴郎見棄於世，所以李慈銘在悼念亡友之時，將緬懷盛世的心情，一轉而爲對現實的不滿，其批評也就愈見激烈。他所批評的，既是官場文化，也是學術風氣。而在古老帝國，學壇又往往爲官場預備之地，故學術不良，則官場風氣亦廢之。回到筆者上節所言，李慈銘的乾嘉情懷，是帶有以學術改變世運的企圖心在裏面，這是傳統讀書人無可救藥的理想性格之顯現。與乾嘉前輩流露出的外道德於知識的論學傾向不同的是，他結合經術文章與氣節德性加以論述，痛批現行的科舉制度使魁桀岸異之士概不得自見，反之則剿襲模擬之徒挾庸惡講章、腐爛程藝，求所謂進士之一科。如此則人才衰而世道亂，亂亟而求才，而繩墨益嚴，才益不出。他感慨自己來到京師首善之區，所交天下士，不論得售與否，皆蒙然張口，如坐雲霧，或習爲妄言，欺世盜名。至於求其有志於文章經術、氣節德行者，則渺不可得。這些悚動言論背後，潛藏的是李氏的銳利觀察。在他看來，科舉制度對乾嘉經術文章有極大的排斥性，二者如方圓不相入。但是，這樣的科舉制度，無法培養出真正的人才。原因很簡單，此一制度使廣大的士子將一生絕大部分精力用在制藝爛墨的剿襲模擬以求一售，而不是用心於深研經史，砥礪氣節之上。如此，又何能出現真正的人才？

而即使真有能超越八股的視野、將心力投注於經史考證之學者，也不過是預流風會、弄潮逐浪之輩，不見得真能厚植學術根柢與具有開闊的學術眼界。如言：

嘉慶以後之爲學者，知經之注疏不能遍觀也，於是講

《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遍觀也，於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偷矣。道光以後，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考，而講古器矣。至於今日，則詆郭璞為不學，許君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刊，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為足補經注矣；間購一缺折之贗器，亦未嘗辨也，隨模刻畫，以為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冊，而《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為無足觀矣。目錄則晁、陳何所受，焦、黃何所承，不及問也；但取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為不勝詰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遊談廢務，奔競取名，然已為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同治壬申十月初八）

一如文章開頭所提到的，王標以“失範”來概括李慈銘對道光以降學術的批判，隱含的潛臺詞是對乾嘉學術的嚮往。這樣的觀察很有意義，但個人以為李慈銘所批判的，不僅只是學術場域的“失範”，而是全面的文化淪喪，學術只是其根源問題而已。當李慈銘對那些《爾雅》、《說文》不能讀，金石、目錄不能考，卻能抗衡公卿，傲睨人物，遊談廢務，奔競取名的“若而人者”，形容為已是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時，我們還怎能期待他對等而下之的爛墨程藝追隨者，會有何種好言語？

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對自身所持學術的自信，以及對現行舉才制度的極度不滿，所以他要反其道而行，以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決絕，站在主流的對立面，力圖挽救世道人心。於是嘻笑怒罵，與世違異。所謂“入都門以後，乖迕時好，益自沮喪，遂反而為考訂章句之學”<sup>[40]</sup>，就是這樣的心態驅使的。當然，乖迕時好是有的，益自沮喪大概只是客套話，至少從字裏行間品不出這樣的氣息。來看他的《復某書》：

僕息交絕遊，政畏見妄人，聞妄語。足下於僕，非總角之好，無平生之歡，乃以絕不相涉之言，妄附於諍友之列，誠僕所不解。頃復以長牘見責，詆僕爲妄，且恐僕不能句讀而自句讀之，吾之妄人自有所歸也。足下少年得意，讀一二破碎書，自以爲見理已深，狂譎百出。僕誠未聞道，亦不足稱文人。然如足下者，恐須息心靜氣，從僕等遊十餘年，方可啓齒牙也。僕老多病，無閑力氣與後生較是非，原書附還，以後見絕可也。（光緒四年十月初九）

他以極辛辣的語氣回擊對方的指控，認爲對方不過讀一二破碎書，就自以爲見理已深，狂譎百出。所以他輕蔑的告訴對方“恐須息心靜氣，從僕等遊十餘年，方可啓齒牙”。最後來個原書附還，以後見絕，戲謔之意，躍然紙上。最後還在《日記》裏附記道：

妄人日記約十餘紙，記三四月之中經濟、學問、文章，其疵謬百出，不勝言。此四條偶拈一二葉中，切舉其最荒唐無理者告之，且戒以非所宜言。亦憐其小有才，冀教正之也。而負氣不服，遂肆橫逆，是余過矣。（同上）

這樣的文字當然是不莊重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爲李慈銘嘻笑怒罵的文字背後，沒有一顆嚴肅的心。先來看他初入都時，在《日記》裏寫下對自己仕途的期許。他說：

以平日所學，得致身清要，侍從出入，掌制作，典詔命，鼓吹潤色，正復不敢多讓。或待總轄軒之任，出書文枋，必能興厲多士，爲國家振舉文治，與兩漢同風。即授白簡冠執法，亦能奮不顧忌，侃侃論執，有裨大計，如古諫臣。下之，俾以一小郡小邑自效，循良不擾，與民教養，以所學爲政，固當爲俗吏先也。（咸豐九年十月廿五）

上列所述的爲官排序，表明的是李慈銘期待自身所學的致用之

地。或者潤色鴻業，或者興厲多士，或者白冠執法，或者小邑自效，都是期望以其學識，在不同層次的官場上，帶來轉移風氣之效。再來看他的一段書信，在《上閻丹初尚書書》中，李氏道：

或以其少習詞章，喜爲語言，頗掇拾一二，謬相稱許；或亦推獎其經史之學，目之爲考據家。然慈銘本心，頗欲整齊物類，申明典章，以尊朝廷而清風俗。其次亦欲自效一隅，以禮義廉耻振飭人心，使其日漸於教化，而稍興於禮樂。即不然，亦冀爲天子諫官，守正蠲邪，裨助百一。<sup>[41]</sup>

觀李氏之意，不論是因為詞章可觀而謬相稱許，或者因為經史之學有獨到之處而被推崇爲考據專家，這都不是他所在意的。他最在意的是世道人心的振救，希望以其經史詩文之學，發揮影響力，廓清風俗。需要指出的是，李氏所欲廓清之風俗，並非庶民淫祠迷信之節慶科儀，而是士大夫學植荒落的斯文墜地。李氏所謂的整齊物類，申明典章，其用意在此。再來看一則書信：

比來京師，所見學士大夫，荒陋尤甚，益痛世運陵遲，斯文墜地，愈不自揆，欲以區區一簣，障塞橫流。<sup>[42]</sup>

有人認爲李氏雖文名早著，然而屢困棘園，宦途極不得意，這就養成了他孤介的性情，每每對人盛氣罵之。推源溯始，也是一種變態心理的發露<sup>[43]</sup>。然而筆者以爲，這其實是一種知識不對等心態下的救贖心理所演繹出的超我人格。在他看來，萃集京師的一國精英，學識荒疏，令人生厭。這也讓他益加痛心世運陵遲，斯文墜地，而思以一人之力，障塞橫流，以拯救之。這樣的想法，不斷出現在其文字之中。如在《復陳晝卿觀察書》裏，這樣的態度就更爲清楚：

弟窮於世久矣，世亦無一人知我者。然自辛未再入都，至今十餘年，雖貧悴冗散，衆謗群疑，而以一身屹立於波靡之中，扶植名教，激揚廉耻，竊冀自附於大過獨立不懼之君

子,而上爲朝廷裨助風化之百一,往往於義利之關,邪正之辨,大聲疾呼。風雨如晦,誠知其愚。區區之心,不能已也。<sup>[44]</sup>

簡單來講,李慈銘想做的,就是學術上的清流人物。當時政壇清流人物有南北、前後之分,以中法戰爭爲界,北清流活躍於前,南清流崛起於後。潘祖蔭、李慈銘、陳寶琛、王懿榮、張之洞、張佩綸、李鴻藻、寶廷、黃體芳等人,皆負一時人望<sup>[45]</sup>。換言之,李慈銘所欲爲者,就是作爲一個即使遠離權力核心,卻仍可以在輿論上對政治風向與學術風氣乃至世道人心展現其影響力的無冕之王。從這個角度來看,王式通對李慈銘的觀察,可謂深探李氏之心:

先生說經確守乾嘉諸老家法,於史學致力最深。平生矜尚名節,務矯俗流,有裁制人倫、整齊物類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少伸,形諸簡觚,可知梗臬。<sup>[46]</sup>

逆流式的人物,往往是悲劇之英雄。令人感歎的是,歷史的話語權,往往不會落實在這一類人的手裏。晚清民初間對李慈銘的許多形容裏,往往批評他對同時名流,極口漫罵,不留餘地;又說他舞文無行,爲人輕險;能說出他略脫形骸,不拘細節,但大處磊落慷慨的,已算是極高評價<sup>[47]</sup>。但對於李慈銘內心之中,那種出於對盛世文章的深深追念,轉而欲以學術挽救世道人心的理想,能同情理解者,想必尚屬罕見吧。

### 三、對許、鄭漢學的維護

李慈銘既以乾嘉學術爲其裁制人倫、整齊物類的依據。那麼,他對乾嘉學術與人物的評論,大體來講,是維護多於批判,贊揚遠超糾謬。即使對某人之經說考史有疑義處,也能平情討論,少有挑剔之語。雖然李氏所持的乾嘉學術概念,在不同的論述



中，會用許、鄭之學，或文字訓詁、漢學考據等不同語詞來代用，但有一點相當明顯，即使是乾嘉第一流的學者，只要對鄭玄有不滿的，都會被李慈銘批評一番。換言之，李慈銘心目中的乾嘉學術，基本上可以與鄭氏學畫一等號，亦即是以鄭氏學為其心目中的乾嘉學術之共業。批評鄭玄，即是破壞他對乾嘉的完美想像。正如王重民所言：“李慈銘治學，‘宗許、鄭之家法’。”<sup>[48]</sup>不過李慈銘尤為推崇鄭玄注疏、訓詁、考據之學，並有“畢生高密學”之願。他在日記、文集中有多處對鄭玄之學作了鞭辟入裏的闡發，並曾不無遺憾的認為世之能通鄭君之旨者甚少，所以他要列鄭玄經注而為辨明之。今觀李氏之言：

弟嘗謂鄭氏遍注六經數百萬言，既繁且博，自難並絕小疵。又時習讖緯，朝廷所尊，狃於聞見，間一援引，以曉愚蒙，不得為過。著述既多，門徒益盛，復不免假託師說，雜糅其間，故或先後不同，從違不一。後儒挾私尋釁，譬於江河之大，求泥沙之微，固無有不得者。<sup>[49]</sup>

李慈銘分三個層次來為鄭玄開解，首先就是數百萬言的經說，既繁且博，自難並絕小疵；其次是以讖緯解經，既有尊朝廷功令之故，亦有藉讖緯以曉愚蒙之因；另外就是著述既多，門徒亦盛，間有不肖假託師說，雜糅其間，造成先後不同，從違不一的情況出現。但這些情形就像是江河之大，固有泥沙之微，後儒挾私尋釁，自是無有不得者。所以不能藉些許小疵，就否定鄭玄注經之功。

基於上述立場，李慈銘對批評鄭玄者，總是給予嚴厲回擊。例如萬斯同在《群書辨疑》裏對鄭玄論禘祭而一人持數說，表達了不滿，就招致李慈銘的痛批。其言云：

鄭氏之說《禮》，獨絕千古，禘禮大祭，尤所致詳。諸書所釋各異，貫通之，則無不合也。至春夏四時之祭，周制本無禘名，鄭曰“蓋夏、殷之祭名”者，疑詞也。萬氏論禘，自

可備一說，而痛詆鄭君為妄為無稽，亦自陷於妄而已。夫以朱子之奮臆自信，勇於立異，而說《禮》獨墨守康成，不敢輕議，晚世小儒，一知半解，廝攻無忌，是經術之大患矣。<sup>[50]</sup>

根據《周禮》，禘、祫皆為殷祭，非春夏四時之祭。所謂殷祭，指的是盛大的祭典。禘是五年一次合祭諸祖神主的大祭，祫則為三年一次的祖廟大祭。李慈銘對於萬氏說禘禮而不滿於康成“蓋夏、殷之祭名”之說，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認為康成所言，是疑詞而非定見，萬氏何須必以康成為非？他甚至擡出朱子說《禮》獨能墨守康成，而批萬氏為晚世小儒，其一知半解之見是經術之大患，可見其護衛康成之心如何強烈。

另外，在《夫之諸祖父母報說》一文裏，李氏則痛批程瑤田悖古滅倫無忌憚，其《喪服足徵記》實周孔之罪人，不止為鄭學之蠱賊<sup>[51]</sup>。又在《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鄭注考》一文中，李氏批評梁武帝分別“三慈”，以為專以慈母為傅母，而遺諸母，是多乖經義。李氏自言間嘗反覆鄭君此注及《齊衰三年章》注、《總麻章》注，《禮記》《曾子問》、《內則》、《喪服小記》諸注以求之，而知其脈絡貫通，條理精密。惟此注實有傳寫上下倒易之處，且歎世之能通鄭君之旨者少也，故分列經注而為辨明之<sup>[52]</sup>。另外，在《復徐壽翁書》裏，他批評郭嵩燾說：

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朋鱗。……所著書浩博亡涯涘，用意亦極精密，惟其書名何不曰《禮記補疏》或裨注之類，而必曰《鄭注質疑》？竊恐世之能讀鄭注者，已無幾人，而空腹高心、剽宋人之議論以詆漢儒者，轉得以為口實，是反為郭公病矣。<sup>[53]</sup>

言下之意，他倒不是認為郭嵩燾的學問不够好，而是擔心世之能讀鄭注者，已無幾人，郭氏卻又高舉質疑鄭學的大旗，這無疑會給予那些空腹高心、剽宋人議論以詆漢儒者以口實，對郭氏本人反而不好。但說穿了，如此議論還是出於一種維護鄭玄的心思。

而在《與顧河之孝廉書》裏，他羅列乾嘉以來務反鄭玄者之名，嚴加批判，以為正是諸家喜與鄭為難，導致持宋學者，借端排毀，經學遂微，不及卅年，漸滅殆盡。其云：

說經之家，昭代為盛，乾嘉之際，碩儒輩興，間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至劉申甫、臧在東、陳碩甫諸先生出，拾遺補闕，其學愈密，而尊奉西京，藉薄東漢，頗詆康成，以信其說。故孫伯淵氏謂“近來學者好攻鄭氏，其患不細”。蓋孫氏同時，若程易田氏、焦里堂氏，皆喜與鄭為難，而段懋堂承其師傳之說，亦有違言，卒之姚姬傳、陳碩士輩，借端排毀，經學遂微，不及卅年，漸滅殆盡。好高之過，其弊至此。<sup>[54]</sup>

李氏指出，當時漢學內部，有兩股與鄭玄為難的力量：其一是劉逢祿、臧庸、陳奐等尊奉西京以薄東漢者；其二是程瑤田、焦循、段玉裁等學風近於戴震者。他認為正是漢學家內耗的緣故，使宋學家能趁隙借端排毀，認為經學之衰微乃至漸滅殆盡，皆是此輩好高之過所導致。這樣的學術論斷，是否為實際的學術史實，大有討論之空間。但是對於與鄭玄為難者，即使是大儒如段玉裁、焦里堂之輩，也在其批判之列。由此而亦可知，他護持鄭玄之心，究竟有多堅決。

當然，最能體現李慈銘護持鄭玄之心情的記載，是數十年不曾間斷的《日記》。從《日記》中，常可見他對說經能闡明鄭氏者，不吝給予褒獎，例如褚寅亮《儀禮管見》專明鄭注、務申古誼，就得到李氏的稱許（光緒辛巳十月十五日）。又胡培翬《儀禮正義》有補鄭、申鄭之例，李氏則稱其包羅古今，兼列異同，精核綜博，一時絕學（同治己巳三月廿五）。但是對於務反康成者，亦是給予嚴厲批評。如言：“比日讀顧惟康（廣譽）《學詩詳說》，其書雖自稱不專漢宋，然實墨守《集傳》，攻擊鄭《箋》，於鄭間有取而不敢直言其是，於朱亦有一二異者而不敢顯言其非。蓋嘉興守張揚園、陸三魚之學者，惟恐以一語背朱，為得罪聖門，

猶不出學究之見。”(光緒己卯六月初八)而對於自己家鄉前輩如范家相、茹敦和、邵晉涵等人不信鄭氏,李氏亦深感遺憾。如言:“閱范左南(家相)先生《詩瀋》。其中說《詩》,多有名言雋旨,蓋出於鄉先輩季彭山先生《詩解頤》之派;其考據典禮,亦多心得,而不甚信鄭君。吾越說經家法,皆如是也。”(光緒乙酉正月廿一)<sup>[55]</sup>

在《日記》中,隨處可見李氏對維護鄭玄之執著;而這種執著,隨著年齡的老大,也就越見明顯。來看一段文字:

閱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其書臚舉鄭注,所載古今異文,援據《說文》及古籍訓故,詮其通假,辨其正俗,務明鄭君取捨之義,至為謹嚴。《自序》謂墨守鄭學,鬯厥指歸,良不誣也。(同治庚午五月初四)

這一段同治年間的日記,以嚴謹不誣稱許胡承珙能明鄭玄取捨之義,但是到了光緒年間再重論胡氏此書,卻有了不同看法:

閱段氏《周禮漢讀考》。段氏此書義理精深,足為鄭學津逮,惜其《儀禮漢讀考》僅得一卷。胡墨莊作《儀禮古今文疏證(義)》,雖意在補段,其考證亦甚精析,而於鄭君之義猶多游移,蓋胡氏說經不主高密家法,觀其《毛詩後箋》可知矣。(光緒丙戌十一月廿一)

按《毛詩後箋》宗旨在於申述毛義,胡培翬在《胡君別傳》中即言:“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sup>[56]</sup>書中凡是認為鄭《箋》有失毛氏宗旨者,必從本篇、本經或他經反覆尋考,力求貫通詩義,以證明毛氏詩旨。然李氏批評《毛詩後箋》云:“此書紬繹經文,體玩自得,乃宋歐陽氏以後之法。唐以前家法皆重訓詁,而不為序外之說,所以可貴也。”(光緒壬午六月十五)顯然不認同他以歐陽修為式的說經方法<sup>[57]</sup>。同樣的,胡氏考證《儀禮》,雖亦甚精析,然於鄭君之義猶多游移,對此李慈銘深感遺

憾。又如言：

閱金輔之《禮箋》，古義湛深，研究不盡。國朝狀元通經學者，以輔之爲巨擘，次則姚文僖文田、畢總督沅、胡尚書長齡、吳侍郎鍾駿、龍布政啓瑞及洪氏瑩而已。（光緒丙子二月初一）

但是十年之後再讀金榜《禮說》，則有不同見解：

閱金氏《禮說》。誠齋（金榜）學過筠軒，而好出新意，果於自用，於鄭君注說不能細心體會，輕加排斥，故所論著多異先儒，按之全經，往往不合。（光緒丙戌九月廿三）

這種前後之間評價的巨大差異，在我看來，除了說明李氏的學術見解日益精深之外，與他護持鄭學的心態日益迫切，想亦不無關聯。究其實，仍是對所處學術環境不滿，所出現的反芻心理。這一點，也可以從他對陳奐的批評來加以說明。李氏對近儒爲《毛詩》學者，如汪龍莊、胡承珙、段玉裁等人，皆競申毛說，不主鄭《箋》，感到極大的不滿（同治丁卯九月初四）。他將批評的重點放在集《毛詩》學大成的陳奐身上。李氏言：

近來老儒，若江蘇陳奐碩父之經學，直隸苗夔仙鹿之小學，及戈順卿（戈載，字孟博，號順卿，道光間吳中七子之首）之詞學，海內幾以魯靈光視之。……陳爲段懋堂弟子，授受俱有淵源，所著有《毛詩傳疏》，乃捨鄭《箋》而別爲說者，多取康成以前諸儒之說，徵引浩博，自逞雄辯，蓋段氏之教如此也。凌次仲有言：“今爲漢學者多喜駁康成，殊不可解。”汪容甫言：“吾最不喜今之爲古義者，偏信私決，惡莠亂苗。”昨河之（顧瑞清）言：“陳氏《毛詩疏》中，凡宗廟社稷、國學之地、衣裳之製，皆據古籍單辭，或古本一字之異，盡翻前說，繁徵傳記，以實其言，至於不知所從，此真經學之弊。”然其淵洽貫串，固近日學者中碩果僅存矣。京師諸稱

古學及詩文家，直皆不識一字，不通一語耳。(咸豐庚申八月十二)

個人以為，上列所引諸多文字，它們最大的意義不在於李慈銘的評論是否恰當，而是在於這些評論背後透顯出來的李氏對學術倫理的維護。換言之，他對鄭玄的強為守衛，其實是出於對一種篤實學風的維護之情，而之所以有如此極端維護鄭玄的態度出現，還是與他認為同時代學者文人不學無術，大有關聯。這一點，從他對陳奐的評論就可以看得出來。陳奐卒於同治二年，對身處咸、同之間的李慈銘而言，真可謂乾嘉經學之魯靈光。但從李慈銘引用顧千里後人對陳奐的批評來看，他批評的其實是一種偏信私決，自逞雄辯，務反鄭箋卻又未見統緒的學風，而不是以鄭玄為圖騰的篤實家法。陳奐尚且如此，等而下之者又將如何？所以文末他話鋒一轉：“京師諸稱古學及詩文家，直皆不識一字，不通一語耳。”真可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了。

換言之，他對乾嘉學術的維護，其實就是落實在對漢學家法的維護上。這是一種對於所認同的學術傳統的一種維繫之心，也是一種學術精神的張揚，而其目的不言而喻，即在於標榜一種相應於所處時空類同博依又浮泛瑣碎的篤實學風，用以對治當時文人學士之不學者。當然，他所認為具有篤實學風的漢學家法，就是乾嘉諸儒擅長的聲音詰訓之道、版本校勘之識，以及能廣蒐文獻、參核異同的鑑識之力與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所以，實事求是、考訂精核、具有根柢等字眼，就屢屢出現在他對學有家法之人的評價裏。例如他評論鄒漢勛的《讀書偶識》說：“所記皆經典考據之學，多引近儒戴東原、江子屏諸家說，主於名物訓詁。……其於禮經名物，考訂頗詳，而尤深於小學。”(同治癸亥十月十六)又評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說：“其書實事求是，鈎貫邃密，而《說文》為尤精。於近儒段、桂、錢、嚴之說，多有所補正，卓然不刊者也。”(光緒丙子閏五月初七)又評倪思寬《二初

齋讀書記》說：“其書多考據經義，間及古人詩賦，雖未為奧博，而實事求是，亦漢學之有根柢者。”（光緒丙子四月初二）乃至評道光間大儒陳澧之學，亦云：“閱《東塾讀書記》中《易經》一卷，真實事求是者也。”（光緒壬午八月十三）又言：“閱《東塾讀書記》訖。陳氏取材不多，不為新異之論，而實事求是，切理饜心，多示人以涵泳經文、尋繹義理之法，甚有功於世道。”（光緒丙戌正月初五）這些記載一一顯示出李氏所認定的治學方向，不僅只是乾嘉老輩的學術方法，更重要的是乾嘉老輩的學術精神。再來看一則敘述：

閱江氏《尚書集注音疏》。自注自疏，古所罕見，江氏蓋用其師惠定宇《周易述》家法。惠以荀、鄭、虞等《易》注既亡，掇拾奇零，非有一家之學可據，故不得不為變例。江氏亦以馬、鄭之注，由於輯集，故用其師法。巨儒著述，皆有本原，不得以井管拘墟，輕相訾議也。（同治辛未正月廿三）

蓋惠棟以荀、鄭、虞等《易》注既亡，掇拾奇零，非有一家之學可據，故不得不為自注自疏之變例。而江氏亦援其師法，以馬、鄭之注，由於書出輯集之故，亦自注自疏。李氏認為，此例雖古所罕見，但巨儒著述，皆有本原，不得以井管之見，輕相訾議。可見他對惠氏、江氏輯集叢殘、掇拾奇零的一番傳經之苦功，給予充分之肯定，而對其不得已所建立之治經變例，亦給予充分尊重。事實上，兩位巨儒的學問凸顯出的，就是他們深厚的文獻考訂功力。而對於乾嘉學者的這項成就，李慈銘總是不吝給予熱情贊揚。如言：

古未有形聲、訓故之不明而能通經者，未有名物、象數之不講而能知學者。夫朱子，理學之宗，而或推為集經義之大成者也，然其言曰：“一書不讀，即闕一書之義；一物不知，即闕一物之理。”此不特訓故不可略，而詞章、術數、小

說、釋、老亦在所不棄矣。且經之須訓詁，其事甚嘖，其功甚勞，其效甚微，昔人亦何好焉，而必孜孜於拾遺掇墜、抱殘守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不得已者？蓋章句不明即經旨晦，文字不審則聖學疏，節文、度數、形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食、貨、輿圖均不得其要。寧都羅臺山，為宋儒之學者也，而其言曰：“訓故不明，則文字根不真，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是誠見其本者矣。宋、明以來解《六經》、四子書者，往往有文義不順，近於害理傳教。國朝諸儒深研古義，旁通形聲，多所是正。讀《學海堂經解》一書，博觀而要取之，得失之故，可以恍然矣。若夫詞章乃學人之遊藝，術數為方技之專門，皆非無益於國家者，不賢識小，君子何譏！必世人盡為程、朱，則辟雍之地，又何所容其俎豆歟？<sup>[58]</sup>

這篇文章是他對沈起元主張理學而批評訓詁、詞章等學問的反駁。所以文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舉朱子及羅澤南的言論，反過來說明理學家亦強調形聲、訓詁等知識的重要性，並且贊許國朝諸儒深研古義，旁通形聲，於宋、明以來解《六經》、四子書而文義不順、害理傳教者，多所是正。並且強調要閱讀《學海堂經解》，從中博觀約取，則得失之故自可明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經須訓詁的重要性之強調。他說這事需要用心考辨，過程非常辛苦，收效也很難短時間內即顯現，但為何古人仍堅持此道，而必“孜孜於拾遺掇墜、抱殘守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不得已者”？即在於“章句不明即經旨晦，文字不審則聖學疏，節文、度數、形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食、貨、輿圖均不得其要”。而這些知識若無法掌握，古籍即無法順利通讀，宋、明人解經所以文義不順，近於害理傳教，其故在此。

如此看法，亦難怪李氏對考訂古籍的學術意義特為張揚。如言：

乾嘉以來，諸儒專心考訂，周秦古籍，燦然具明，一洗明



刻之陋。其最以校勘名者，盧抱經、顧澗菴兩家，蓋非六朝以後人可及。它若惠松崖、江叔澣則堅守古文，微失之拘；孫淵如、洪筠軒則愛搜僻書，微失之雜；王石渠、伯申父子則喜爲通論，微失之專。然亦百純而一疵。戴東原之校經，邵二雲、錢竹汀之校史，段懋堂、嚴鐵橋之校《說文》，尤專門名家之學。……予嘗謂古書至於明季，滅裂幾盡，爲厄運之極。故漸興於國朝，至乾嘉間而極盛，乃未五十年，而遭此大亂，板籍毀者十九，此學人之不幸。而世之妄人，乃謂乾嘉以來學術多歧，以致此亂，何其讎視古籍而無人心之甚耶！（同治戊辰七月十八）

李慈銘在這裏對乾嘉以來諸大師在校勘方面的成就作了扼要短評。他以盧文弨、顧千里兩人校勘成就最高，其餘如惠棟、江聲、孫星衍、洪頤煊、王氏父子等，雖微有小失，然亦百純而一疵。至於戴震之校經，邵晉涵、錢大昕之校史，段玉裁、嚴可鈞之校《說文》，尤專門名家之學。經過諸位前輩先正之努力，纔一挽明季書籍滅裂幾盡之厄運。他慨歎未經五十年，而遭此洪、楊大亂，此乃學人之不幸，令人太息再三。卻有世之妄人，竟謂此亂乃乾嘉以來學術多歧所致，故李氏憤然曰：“何其讎視古籍而無人心之甚耶！”顯然對於將乾嘉學術方法與洪、楊之亂作出連結的說法，心懷忿忿。所以在《致陳德甫書》裏，李慈銘就特別談到他步武前賢，據案考訂的樂趣。其言云：

近維日治經史，遍考近儒撰述。蓋考證之學，國朝爲最，國朝尤以乾嘉之間爲盛。能讀其書者，庶於經史無誤文別字，謬詞枝說。士生其後，可謂千載一時之幸。故日盡一寸書爲度，或據案別錄，或仰屋樑思其疑義，頗亦有所論列。此外，唯咄咄歎咤而已。以視兄之痛飲酒，熟讀《離騷》經爲名士者，又有苦樂之間，孰得孰失，不必辨也。<sup>[59]</sup>

李氏自言以乾嘉之法，據案別錄，考訂古書。他自以此爲樂，且

認爲此間之樂，不輸陳德甫《離騷》佐酒的名士風流。原因無他，醉心考證之學，就像醉心於盛世文章之中，自有其樂無窮的意味。再來看他對王昶《金石萃編》的評論：

比日卧閱《金石萃編》畢。……淹貫經籍，旁通訓詁，其浩博終不可及。近來輕薄小兒，率意詆之，多見其不知量而已。（同治甲戌五月初十）

比日多閱《金石萃編》，此書述庵極一生之力，又同時若錢獻之、嚴久能、黃小松、張芑堂等，皆精研小學，碑版顯門，助其蒐討，而錢氏竹汀、王氏西莊、武氏授堂等收藏金石之書，先後已出，盡得取以參校，故蒐羅宏富，抉搯精深，實爲此事之大觀。……要之，其書體大思精，所包甚廣，毫毛之疵，不累全體。較之近時劉燕庭、許印林輩描摩點畫，自夸精細，不過爲骨董清品、鑑賞專家者，奚啻霄壤？世人讀書惡繁，重好新異，不論事實，妄肆遊談，頗有輕議是書者，故備論之。（光緒戊寅十一月初三）

他認爲王昶的《金石萃編》淹貫經籍，旁通訓詁，體大思精，所包甚廣，故浩博終不可及；而近來輕薄小兒，率意詆之，亦見其不知量而已。在光緒年間重讀此書時，他更直接點名輕薄小兒就是劉燕庭、許印林之輩，描摩點畫，自夸精細，不過爲骨董清品、鑑賞專家，何足與於學術？此項評論很清楚的區隔了乾嘉與晚清金石學之優劣，其議論是否客觀，尚可進一步討論，然其議論背後所設定者，其實是對並時學術之不懌，從而凸顯出對前輩的推崇以爲對照。

至於治學篤守家法者，李慈銘更是不吝給予肯定，如論邵瑛《說文解字群經正字》，李氏《題跋》云：

瑤圃先生承其父梅林孝廉之學，又爲二雲學士從子，濡染家風，精覃古訓。自登上第，官翰林二十年不遷，杜門著述，告歸以後，復幾二十年，樸學彌劭。顧二雲氏名滿寰宇，

而先生聲華閭漠，知者絕稀。此書二十八卷，為先生一生精力所萃，深研博綜，務求至當，不特非逞私決臆者所能望見，即視近儒之專治許書，規規穿鑿者，亦不可同年而語。<sup>[60]</sup>

這是對“聲華閭漠、知者絕稀”的邵瑛之學，給予極大的肯定。李氏所肯定者，在於邵氏《說文》在方法上既能深研博綜，務求至當；在態度上又不逞私決臆，規規穿鑿，可以說是乾嘉經生治經的標準模式。

又其論李賡芸之學，則云：“鄭奩所刻書，以此種為最善。鄒齋著述，餘無所傳，片羽吉光，尤足寶貴。其書博綜經史，礪守竹汀錢氏家法，多核實之言。”<sup>[61]</sup>簡言之，嘉許其既能博綜約取，又能礪守家法。又言：

閱《炳燭編》。鄒齋守其師錢竹汀家法，隨時考訂，皆實事求是，不為高遠驚俗之談。其書既未寫定，又中奪於仕宦，未老橫貫，故所著精密遠不逮其師，然有訂正《養新錄》及《金石跋尾》者數條，皆足為詹事功臣。蓋吳門之學，自惠、江、王、錢遞傳，皆以平實切近為主。拾遺補闕，雖所就有小大之殊，而為功於古人，不誤於來學，其致一也。嘉定小邑，經儒獨多，皆私淑錢氏之教。自常州莊氏說經，恃其高識雄力，好為荒渺之論，自托於西京微言，而不知實為南宋餘唾。數十年來，吳門頗為所染，而嘉定獨不稍變，此亦論學術者所當知也。（同治壬申六月廿六）

李賡芸是錢大昕的女婿兼學生。這一則記載需要注意的是，李慈銘對吳門與嘉定之學的贊許，以為皆以平實切近為主。其學術為“拾遺補闕，雖所就有小大之殊，而為功於古人，不誤於來學，其致一也”。尤其稱許嘉定小邑，經儒獨多，以為私淑錢氏之教所致。又更進一步嘉許嘉定之學不為常州莊氏所染，而批評蘇州之學已變，蓋諷潘祖蔭喜為《公羊》之學，潘氏《功順堂叢書》所刻，即收有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

在本節之末,有必要對李慈銘為漢學導致世變所作之辯護,以及對漢學家艱苦守節之贊歎加以介紹,作為對其乾嘉情懷之最佳注脚。按李氏對姚瑩《中復堂集》裏痛詆漢學與國變作關聯的看法,有很尖銳的駁斥:

其《覆黃又園書》,謂“自四庫開館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禮義廉恥為何事,至於外夷交侵,輒皆望風而靡,無恥之徒,爭以悅媚夷人為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豈非毀訕宋儒之過”云云,尤猖狂無理。道光中年以後,時事日亟,正坐無讀書人耳。夷變時,當國者潘、穆二公,非能為漢學者也。……而御史陳慶鏞一疏,最足持當時朝局之敝,陳固漢學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渾沌至此乎?(同治癸亥十二月十六)

其意蓋謂國之巨變,不在無潛心理學之人,而在無讀書人如漢學諸公耳。蓋漢學諸公,在李氏看來,是既有學問識見,又能見出處之節。所以,當姚瑩稱許姚鼐中年告歸,孤立於世,與漢學家竟逐名利之場異趣,以此強調服膺宋儒之學者比漢學家更有氣節時,李慈銘亦提出針鋒相對的看法。他舉出大量的實例來證明,漢學家更多的是恬然淡漠於仕進之途的:

又謂惜抱先生孤立於世,與世所稱漢學諸賢異趣。夫惜抱以郎中告歸不出,誠為恬漠,然漢學諸賢中,若西莊以閣學左遷光卿時,仕僅五稔,年力方盛,遽耳杜門。竹汀以少詹,抱經以學士,皆清華首選,畢志名山。蘭皋官戶部,十餘年不轉一階,此豈皆出姬傳下者?他若聶軒之死孝,北江之孤忠,皋文之梗直,虛谷之廉峻,鄒齋之循良,南江之清介,以論風節,奚愧宋儒?而檠齋、左海,則脫履詞林;芝田、頤谷則投簪臺撫;小雅、孝臣,終身進士;里堂、辰叔,絕意公車;懋堂、申琦(耆),宰縣而早歸;澥亭、仲子,注縣而改教。

又豈以許、鄭爲繫援，魚蟲爲鈞弋者乎？（同上）

在李慈銘看來，這些乾嘉老輩，不論仕宦高低，其氣節皆不出姬傳之下，而其孤忠梗直，廉峻循良，亦是無愧於宋儒。更不會藉許、鄭訓詁章句之學鈞弋攀援，以干當令者。按漆永祥曾引李氏之言云：“清季李慈銘曾論曰：‘蓋漢儒之經學，爲利祿之路，其從師傳業者，無異今之舉業。而國朝諸儒之學，則實與時背馳，宜其愈上而愈困也。’乾嘉諸儒，雖治漢學，然與漢時學術與時代皆不相同，諸人皆注全力於經史，則場屋文字不時作，比至考場，自然生疏；又科舉時文，皆須爛熟《四書》朱注之類，而諸人又不喜朱子，則其落選必矣。”<sup>[62]</sup>指出諸儒正是在學問的歸趨上與朝廷的功令背道而馳，而有愈上愈困之勢。同治初年，李慈銘在閱讀《戴氏遺書》之後，有一深長感慨。他認爲從漢至明，儒者的際遇都要比當朝爲佳。“若我朝諸儒之爲漢學也，則違迕時好，見棄衆議，學校不以是爲講，科第不以是爲取。”自開國之初，以至乾嘉之際，除了少數如阮元等人之外，多告病早歸，或布衣終老，罕有得意之人能如理學諸公一般，躋身當道。李慈銘乃歎曰：

嗚乎！由斯以觀，諸君子之抱殘守闕，齷齪素縑，不爲利疚，不爲勢黜，是真先聖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豈操戈樹幟，挾策踞座，號召門徒，鼓動聲氣，呶呶陸、王之異辭，津津程、朱之棄唾者所可同年語哉！（同治癸亥正月廿四）

不止於此，他對自己所處環境有深刻的認識，基本上是宋學當道，洛閩爲先。他知道堅持所學，則處境維艱，卻不爲所動，依舊朝追隨乾嘉前輩之路邁進：

予質鈍健忘，又處窮陋，馬、鄭之學，禁無端緒，漢、唐之訓，浩無津涯。少時所習科舉講章之業，尚於宋儒爲近；諸家語錄，其文淺俚，又便記誦。近日朝局，頗興宋學。倭公

作相，李公掌憲，以性理導冲人，以道學議密政；又新召山東臬司吳公爲大理卿，皆服膺洛閩，踐履篤實。明詔諄諄，時以格致誠正之旨教迪天下。以予之粗有文章，使承望風旨，附會儒言，既非難事，且可以微名公卿，覬幸登荐。而去冬粵東舉人桂君文燦進所著書，專求漢詁，有詔訓厲以宜爲有用之學，雖留其書而斥其人。前鑑既彰，迷途可復，乃猶質衣買考索之書，傭食讀蟲魚之字，其亦顏尉之違三好，韓子之致五窮者歟！（同上）

綜合以上所述，在李慈銘看來，乾嘉漢學諸老輩，不論在氣節上，還是在學問上，皆足爲一代之典範，而痛惜於典範陵夷之後，舉目所及，皆不學之士，導致人才既寡，國勢日蹙。行文至此，吾人於李慈銘對乾嘉漢學的強爲守衛，當有一直觀之體認：從知識層面上講，漢學諸公對學術客觀性的追求傾向，李慈銘並不排斥，但這絕不是他高標乾嘉漢學的根本目的，更重要的，是漢學在學術規範的展現與學者氣節的養成上，被李慈銘視爲是藥世之良方，在給予無限贊歎的同時，也借之以爲批評之利器。被世人目爲善罵好名的李慈銘，當他對洪亮吉的印象由戇直而樸忠而抗激而孤忠之時<sup>[63]</sup>，想必對乾嘉先正的精神人格以及所以養成之術的漢學學風，當是低迴贊歎，而終身服膺了吧。

#### 四、對反漢學者的撻伐

雖然出於個人的特殊情懷，李慈銘對乾嘉老輩的盛世文章，充滿了贊歎之意，每以不能身處乾嘉爲恨；對諸老篤守之漢學亦深心服膺，並且勤於探索，身體力行。但這不表示他對漢學是全盤接受而沒有疑慮的，對於漢學內部的許多問題，李慈銘總能直指其非，不稍假借。例如閱讀到孫星衍《孔子集語》時，就有感而發，乃言：“蓋漢學諸家愛博之過，往往以多爲貴，不肯割棄，

有寧令人譏其雜，不可令人議其漏者，此其通病也。”（光緒己卯六月廿四）表達了對漢學炫博繁瑣的不滿。又如言：“閱蔣光煦《東湖叢記》。雜舉秘籍佚文，載其序跋，間及古碑，略如盧抱經《群書拾補》、張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志》之例，而不分門類，多掇纖屑，更出吳兔床、袁壽隄諸君之下，蓋近於收藏骨董家，非真知學者也。”（光緒癸未正月十二）對於非真學問的假漢學，亦直言駁斥。

同時，對於前輩在考訂上的瑕疵，李慈銘總不吝提出討論。例如他非常欣賞貴州學者鄭珍的學問，曾給予極高的評價：“閱《巢經巢經說》，鄭珍子尹所著。子尹之《說文逸字》，已為近日卓絕之學。今閱其《經說》，僅一卷，而貫申精密，尤多傑見。其長在於善補經文注文，不為唐以後《正義》所惑，有功於經學甚巨。”（同治壬申九月初七）又言：“夜再閱《巢經巢經說》。中考定《喪服》大功章鄭注二條，反覆詳繹，為最其要略，以小字補書於初七日日記眉端，至二更後，燭再盡而罷。鄭君此論，精貫經文，深明禮志……經學最不易言，《儀禮》尤苦難讀。然遇此等疑義，探索之餘，渙然冰釋，其樂自勝於看他書。今夕續燈，細籀此文，如獲異寶，經義悅人，如是如是。”（同治壬申九月十二）對於鄭珍如此推許，可以說是李氏數百萬言《日記》中，少有的好評。但他也不是一味稱許鄭珍，於其經說有誤之處，亦是直言指出，詳為探討。如言：“閱《鄭學錄》四卷，遵義鄭珍子尹著，所以明康成之學及平生行事也。……其書嚴謹詳核，於司農家法，可謂服膺弗失者矣。中於‘不為父母群弟所容’一條，知引《史承節碑》無‘不’字，而尚泥‘父數怒之’之語，言有‘不’字者為實錄，則子尹僻居播州，未見近時阮文達、陳簡莊、錢警石諸家之說，不知元刻《後漢書》本無‘不’也。”（同治壬申三月廿九）又如對錢大昕之學，李慈銘除了不吝褒美之外，於其說經有失之處，亦是直指其非。如言：“閱《錢竹汀文集》。潛研自為近世集部中一大家，不特《答問》十二卷，考據邃密，其各體文辭旨和

雅,又皆有資於經史掌故,凡所論辨,精確可依。”(同治甲子二月廿五)又言:“閱錢竹汀集中題跋六卷。予每閱《鮚埼亭》、《潛研堂》兩家題跋,深歎其學之無所不賅,令人茫然莫測其涯涘。”(同治甲子三月十六)又言:“錢竹汀氏之學,浩博而精密,國朝漢學諸儒中爲大家,然千慮一失,亦或不免。如武進劉申甫駁其《春秋答問》,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不父也,故楚成王、蔡景公皆不書葬,謂吳楚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實書葬,《三傳》經文皆同,不知錢氏所據何經?實失檢之甚者。”(光緒乙亥四月初二)上述的評論無不表明,李慈銘的治學態度,就是樸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前輩學問,除了欣賞贊歎之外,對說經有誤之處,亦不曲爲避諱。

但是對於以負面態度批評漢學者,李慈銘亦不吝以最強烈的語氣回擊之。李氏所批駁者不慮數十人,此處舉三人爲代表,分別是翁方綱、姚鼐與章學誠。李慈銘筆下的翁方綱,是十足的對漢學充滿敵意的反派形象。如云:

閱翁方綱《朱氏經義考補正》。竹垞之書,捃摭繁富,誠不能無舛漏,補正之事,必不可少。惟覃溪實不知學,僅一二訂其卷數錯誤之字,篇幅寥寥,而時闖入其詆訾近儒、皮傳宋學之謬論。蓋覃溪初亦依傍漢儒,思以考據自見,既而碩學輩出,其陋日形;又爲戴東原所譏,遂老羞成怒,逞臆妄訾。於是罵朱竹垞、罵紀曉嵐、罵阮芸臺,及陳恭甫致書直爭其失,而覃溪底蘊全露,而覃溪亦老不可復爲矣。(同治癸酉五月廿九)

描繪了翁氏詆訾近儒、皮傳宋學的形象。又言:

閱翁批《戴氏遺書》,惟《文集》及《毛鄭詩考正》、《詩經補注》兩種,所批皆大字涂乙,盡言痛詆,其中未嘗記姓名及圖章,而觀其所言與字迹,真覃溪也。覃溪金石之外,絕不知學,凌仲子最爲受知高弟,而《校禮堂集》中,未嘗一



引其說。閩人何支海（治運）亦其高足，而跋《經義考補正》，縷舉其失，謂覃溪譜錄之學，當推我朝第一，而說經非其所長。陳恭甫《左海文集》中有《答覃溪書》，必詰其所訂阮氏《說文校刊記》、段氏《周禮漢讀考》之謬。今觀此書所評，或詆其文理不通，或詆其好造異說，蓋東原文辭簡質，多非覃溪習於文從字順者所能解。而覃溪又並注疏未嘗細讀，《爾雅》、《說文》之義，尤所不知，遂疑他人為造作。（同治癸亥正月廿四）

此處主要是揭露翁方綱於注疏未嘗細讀，於《爾雅》、《說文》之義，尤所不知，卻盡言痛詆戴、段、阮諸人，反遭批駁的事實。又言：

覃溪之學，長於簿錄，其評書法，尤為專家，考求印記，辨別點畫，南宋姜、岳以來一家之學也。文亦頗有真意，議論亦有佳者。惟於經學甚淺，而好詆訶，往往謬妄。又知並世經儒輩出，力不能敵，遂遁而言宋學，以程、朱壓人，實於宋學尤無所知也。（光緒己卯四月卅）

此處則是描述翁氏無力與漢學諸公競逐，遂擡出宋學以壓人的窘態。又言：

閱《復初齋集》。覃溪於汪容甫、戴東原醜辭妄訐，於惠定宇之《周易述》、張皋文氏之《儀禮圖》，亦深詆之，此由未窺門徑，老羞變怒，不足深責。（光緒癸未八月廿四）

此處則是以翁氏深詆漢學諸公，乃是“未窺門徑，老羞變怒”之故。按翁方綱實為乾嘉第一流學者，經學、金石、詩文俱佳。他遍讀群經，曾為《書》、《禮》、《論語》、《孟子》諸經作《附記》，並且為《經義考》做補正。尤其精通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五經正義》，考證至精，學界推服。所為詩，頗具學人之詩的特徵，能將諸經注疏、史傳考訂、金石文

字諸學，融貫冶於一爐。而且從正史所塑造的翁方綱形象來看，他雖然不以戴震的聖人之道必藉訓詁明之的治學路徑為然，但至少應該是個袒護考據、精研訓詁的學者。例如《清史稿》就說：“方綱精研經術，嘗謂考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為主，《論語》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時錢載斥戴震為破碎大道，方綱謂：‘詁訓名物，豈可目為破碎？考訂訓詁，然後能講義理也；然震謂聖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則不盡然。’”<sup>[64]</sup>但是李慈銘筆下的翁方綱，卻是醜態百出，既譏其依傍漢儒，誤隨風會；又諷其經學甚淺，往往謬妄；又將他力不能敵並世經儒，乃遁而言宋學，以程、朱壓人的複雜心態，鈎勒而出。至於翁氏對同時乾嘉諸老的肆意詆醜，更是讓李慈銘憤憤不平。究其原因，不難與他對漢學的強為守衛心態聯繫起來，所以就算翁方綱精於金石考訂，對漢學訓詁亦有平情之論，但李慈銘還是從翁氏文章的字裏行間中，品出了他對乾嘉漢學的敵意，遂招致李慈銘的批判。

翁方綱之外，李氏批駁最力者，尚有以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例如在讀到姚範的《援鶉堂筆記》時，李慈銘作了如下的評論：

《援鶉堂筆記》共二十卷，其體例蓋仿何氏《義門讀書記》，即其手批群書中拾掇而成，曰援鶉者，取揚子《法言》“援我手之鶉兮”語。注云：“鶉，和也。”鶉乃醇之借字。薑塢之學，專心考訂，實事求是，確守何氏、惠氏家法。桐城自望溪方氏鹵莽言經，流為妄誕，薑塢起而救之，願一傳而其從子姬傳，以右文自命，所為經說，惠立異論，頓非家學之舊，群瞽和之，其弊遂肆。方東樹者，尤猖狂不學，為無忌憚之小人。薑塢曾孫石甫按察，惑於方說，遂并忘其祖。是書後有重刻本，更定卷次，多載方語，迂謬庸瑣，大與本書相違。此為初刻本，雖多誤字，而未遭點污，誠可貴也。<sup>[65]</sup>

文中李氏強調：桐城之學自方苞鹵莽言經之後，流為妄誕一路；而姚範以實事求是，確守何氏、惠氏家法的考訂之學，起而救之。無奈一傳至其從子姚鼐，雖以右文自命，然所為經說，好為異論，頓改家學舊觀。且姚鼐自出都之後，聚徒講學，弟子聲勢頗眾，彌然以其言為式，而其學之弊端遂擴散開來。其中尤以方東樹最為猖狂不學，李氏目為無忌憚之小人。而姚範之曾孫姚瑩惑於方東樹之言，竟棄其家學範式。《援鶉堂筆記》重刻本多載方東樹之語，李氏批之為迂謬庸瑣，大與本書相違，而慶幸初刻本未遭點污，實為可貴。李氏在《日記》中，更是不乏對姚鼐及桐城派的批判。如言：

閱《惜抱尺牘》。……惜抱經學甚淺，為同時漢學諸儒所輕，因循而尊宋儒，貶斥惠定宇、戴東原、朱石君諸君子；至自夸其筆記中所論史學，謂足與錢辛楣相匹；且以與袁簡齋素好，謂浙中可與竹垞、西河抗衡；則不識輕重之言矣。又謂凌仲子文集一無足取，此塗軌迥別，其是非又不足論也。（光緒丙戌六月十四）

李慈銘此處對姚鼐的批評，與其對翁方綱的批評頗為類似，都是經學甚淺，為漢學諸家所輕，遂遁入宋儒門戶，為難漢學諸公。至於自誇史識堪比錢大昕，等袁枚於朱彝尊、毛奇齡，謂凌廷堪文集一無所取，皆足以表示姚氏不識學術之輕重，不足與其較論是非也。再來看《日記》兩則：

蓋姚姬傳雖講求經術，然頗為異論。以後桐城、宛陵及江右、新城空疏妄謬之學派，實自姬傳聞之，若方東樹、陳用光、梅曾亮，尤其著也。（同治壬戌三月初一）

閱邵員外懿辰位西《遺文》一卷，又《禮經通論》一卷。員外仁和人，以文學負重名。辛酉杭州陷，死焉。所著多散失，遺文僅三十五篇，沿桐城之派，疏冗無法。其議論亦依附戴祖啓、方東樹諸人，力攻漢學。至云千古師傳之學，至

乾隆中而亡；又屢言乾隆中俗學橫流之弊，是不特妄詆名儒，且顯背高廟昌明正學之盛心，近於猖狂而無忌憚。（同治戊辰閏四月初三）

晚清民初倡議新文學諸公，有一響亮口號曰“桐城謬種，選學妖孽”，主要是對有清一代文壇具有大分量的駢文、散文兩派，作嘲諷式的攻擊。對清代經學與文學之關涉稍有理解者，當知文章分駢、散主張的背後，還有一層漢學、宋學的立場為支撐。觀李氏上述二則《日記》所言，都是對傳姚鼐之學者空疏妄謬，好詆名儒的批判。雖未直言此為“桐城謬種”，然已見其意矣。

桐城之外，被李慈銘列入批判對象者尚有章學誠。在李氏的日記與書信中，不乏對實齋的評論。雖有稱許之處，然總體言之，更見否定之意。此處僅舉二例，以見其概。如言：

點閱閩人何治運《何氏學》一過，繫以跋云：吾鄉章實齋譏近儒著述，多自稱某某學，謂誤用《漢書》某經有某氏之學語而不通。案近儒經說之稱某某學者，乃用何邵公《公羊解詁》稱何休學之例，明謙辭也，非用《漢書·儒林傳》語。章氏疏於經學，自蔽而嫉賢，好詆切並時江疆濤、戴東原、汪容甫、洪北江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考。（同治癸酉七月初五）

此處是對章學誠疏於經學的批評。的確，經學著述而稱“某氏學”者，其精神是襲取何休《公羊解詁》稱“何休學”之意，表示學有師承之自謙也。今觀徐彥《公羊疏》引《博物誌》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為允，是其義也。”<sup>[66]</sup>學者若依《漢書·儒林傳》某經有某氏之學的體例自稱其學，如非井中窺天之輩，亦屬狂妄自大之流。至於章氏好詆訾並時漢學諸公，尤與汪中為水火不相容，已是學術史常識，此處不贅叙。所當注意的，是以下這則評論，觸及到的是章實齋治學方法的問題。

其言：

實齋於志學用力甚深，實為專家。而自信太過，喜用我法。嘗言作史作志，須別有宗旨，自開境界，此固可庸下針砭，而其弊也，穿鑿滅裂，盡變古法，終墜於宋明腐儒師心自用之學。蓋實齋識有餘而學不足，才又遠遜。故其長在別體裁，核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則讀書鹵莽，糠粃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泛持一切高論，憑臆進退，矜己自封，好為立異，駕空虛無實之言，動以道眇宗旨壓人，而不知已陷於學究雲霧之識。後之不學之士，耳食其言，以為高奇，遂云漢後無史，唐後無文。持空滑之談，以蓋百家；憑目睫之論，以狹千古。自名絕學，一無所知，豈不大愚而可哀哉！（同治己巳三月十二）

蓋朱、陸爭鋒，象山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之語，表明了朱、陸學問風格之差異。擬諸實齋與漢學諸公，在治學上，亦有先立宗旨與文獻為先之異途。在實齋看來，別有宗旨，自開境界，較之爬梳異文，鉅訂古字，更能近道；在李慈銘看來，此舉卻是墜於宋明腐儒的師心自用之學。李氏雖許實齋有別體裁，核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之才，卻又批其讀書鹵莽，糠粃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乃泛持一切高論，憑臆進退，矜己自封，好為立異。所謂駕空虛無實之言，動以道眇宗旨壓人者，略如八股行文之破題見意，故李氏批評其不知已陷於學究雲霧之識。當然，李慈銘出於本位立場，擔心後世不學之士耳食其言，造成學術不良的影響，所表達的憂慮，於今觀之，大可不必。正如漢宋異途，同為求道之門徑；實齋以文史之學亦能近道，不必如戴震依典章名物以得聖人之道，同為治學之兩極，不必強分其軒輊<sup>[67]</sup>。

李慈銘對反漢學者之批判，已略如上述。但是在李慈銘內心之中，卻是對於漢學在傳衍過程中所產生的流弊，最感痛心。

那是一種對學術墮落的無奈之情，如萬里黃河，挾泥沙俱下，不可遏止，乃至橋逾淮而為枳，在漢學內部產生了變種與支流。而這種變異又反客為主，使學術之正統黯然失色，而遭到反漢學者藉以為攻擊之口實。這樣的深沉憂慮，經常在日記或書信中出現。如言：

乾嘉以後，為漢學者，固多流蔽，無論阮氏詁經精舍及學海堂中諸子，不免依附剽竊；即如常州之臧氏鏞堂、莊氏述祖，徽州之程氏瑤田、汪氏嬰萊、俞氏正燮，雖塗徑各別，皆博而失之瑣，密而失之晦也，亦非吾之所取也。毛氏之《易》、劉氏之《公羊》，所謂道其所道者也，尤吾所不知也。而毛氏說雖創，要亦自博考深思而得，終異於嚮壁虛造者；劉氏又不過漢儒家法之偏，此吾前所云為漢學者，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至也。（同治癸亥正月二十四）

這則短文揭露出四個不同層次的漢學流弊，有必要稍做說明。首先是有依附剽竊的情況，如詁經精舍及學海堂中諸子的課藝之作；其次是博而失於瑣、密而失於晦之病，簡單來講，就是好奇炫博，愛掉書袋，卻雜蕪而不易索解；其三是自道所道，不由舊轍，最為李氏所不能接受。這種自道所道又分成兩種情況：像毛奇齡雖不守漢儒塗軌，自創其說，卻也是博考深思而得，而非出於嚮壁虛造<sup>[68]</sup>。但是他批評劉逢祿為漢儒家法之偏，最堪玩味。原因無他，劉氏入室操矛，援漢學家法治經，卻反為漢學之害。他所謂的“為漢學者，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至”，指的就是這種情況，而這也是李慈銘最為憂心與無法接受的地方。再來看一則書信：

莊珍藝有言：“漢學之存於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同，要當珍若拱璧。”弟常心佩，以為名言。至如孫氏之注《書》，酷信緯學；劉氏之說《春秋》，尊之《公羊》，力申黜周、王魯、三統之義，謂夫子借以行天子之事。莊氏謂《夏

小正》即《連山易》，改其名爲《夏時明堂陰陽經》，此皆意過其通，驚世駭俗，反爲宋學助之攻矣。<sup>[69]</sup>

從學術流變的角度來看李慈銘的觀察，可謂有見。許多學術史著作，每每從晚清今文學的角度來論述劉逢祿的《公羊》之學。其實，孫星衍的《尚書》學、莊述祖的《夏小正》之學，以及劉逢祿的《公羊》學，都是漢學大潮的產物<sup>[70]</sup>。他們的治學特色，也確實是將僅存的漢學文獻，做精密的蒐集與重組，然後加以引申。問題是，這種帶有先驗藍圖的治學方式，想像多於謹慎的思考，經學的理想性蓋過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其實與謹守許、鄭矩矱的乾嘉經師之治學理念背道而馳，他們的驚世駭俗之見，反倒成爲宋學之人攻擊的口實。李氏乃言：

予嘗謂本朝經學極盛，而如孫淵如之酷信讖緯，主以說《詩》、《書》；劉逢祿之言《春秋》，力主黜周據魯以《春秋》當新王之說，謂夫子借此以行天子之事，損文用忠，變文爲質，爲通三統；及莊氏之以《夏小正》爲《連山易》，皆意過其通，不免於驚世駭俗。其後姚姬傳倡言宋學，異論一出，方植之、陳碩士之輩起而和之，至詆諸儒爲異端，雖瞽談狂吠，迅就消滅，而乘間抵細，因緣爲難，亦諸先生授之以口實也。  
(咸豐辛酉六月十七)

我們要注意的是，李慈銘對孫星衍、劉逢祿、莊述祖的批判，是置於漢學語境下進行的，而不是別出漢學之外。所以他提到宋學者的乘間抵隙，因緣爲難就更具有筆者上述所言，漢學內部別子爲宗，入室操矛之害。尤需注意的是，李慈銘有將漢學流弊之責集中在常州之學的傾向。如果我們再加上這一條：“漢學之遭妄人掊擊者，實常州之臧氏、莊氏詒之口實耳。”（同治辛未九月廿）就更能清楚李慈銘對常州之學的痛惡之情，其來有自，正由於常州諸子能以漢學方法，道其所道，使得乾嘉漢學諸公樸實無華之學術精神，蒙上陰影。融漢學主張與《公羊》之學的常州

學派,尤其最爲李氏不喜。來看這一則論述:

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棟,諸儒考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窮年莫殫,又自知必不能過之,乃創爲西漢之說,謂微言大義,汨於東京以後,張皇幽眇,恣臆妄言,攻擊康成,土沮冲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爲章句釘釘,名物繁碎,敝精神於無用。甚至謂海夷之禍、粵寇之亂,釀成於漢學。實則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書,寐語醉夢,欺誑愚俗,其所尊者《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露》、《尚書大傳》,或斷爛叢殘,或悠謬無徵,以爲此七十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古誼。復蒐求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注》、《今文尚書說》、《三家詩考》,攘而秘之,以爲此微言大義之所在也。又本武進莊存與之說,力尊《公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爲輿皂,比《左氏》於盜賊。蓋幾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較之爲宋學者尚須守五子之語錄,辨朱、陸之異同,用力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光緒七年四月初二)

李慈銘的批判,雖然是出以負面之言,但以一個長期研究常州學術之人的理解來看,卻不可謂所言不到位。需知即使高標西漢之說以對治東漢許、鄭之言,都只是漢學大潮內部學術語境之轉換。更不用提即使曾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爲章句釘釘,名物繁碎,乃是敝精神於無用,常州諸子同樣精於考據訓詁之法,否則又何能摭拾《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露》、《尚書大傳》的叢殘之說以爲己用?又如何能援據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注》、《今文尚書說》、《三家詩考》以助其說?其實最令李慈銘無法接受的是,以漢學考據之法嫁接《公羊》微言大義之說,讓漢學跳脫章句訓詁的層次,使其方法有了宗旨與靈魂。這種運用殘缺不全,卻號稱保有七十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古誼的西漢典



籍，演繹聖王微言大義的學風，在執守乾嘉矩矱的李慈銘看來，就是非聖無法，病狂喪心，招致他嚴厲的批評，也就理所當然了。

再來看幾則文獻。在評論劉逢祿、戴望持《公羊》以論學之作時，李氏每每做出苛刻的評論。這些評論背後隱藏的，都是李慈銘感慨後起的常州之學，以朱為紫，使乾嘉諸老輩建立起的篤實學風，一轉而為高蹈空虛之言。所以心懷憤憤，出語如刀。如言：

閱《劉申受集》。其《論語述何》篇，誤據《北堂書鈔》以“女為君子儒”章何晏注為何休注，遂妄斷邵公有《論語注》，其謬既不待言；而以此注“君子儒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二語，謂漢儒惟董江都及邵公能道之，馬、鄭諸儒皆所不知，真是夢語風譎，大惑不解。申受知讀舊鈔本《北堂書鈔》，而不知讀注疏，自來郢書燕說，無如是之可笑者。流毒潰疽，遂有如今日之戴附生，竊其糞穢，以成夢書，急當以大黃峻藥，痛下其疾，令出狂汗者也。（同治壬申六月十三）

閱戴望《論語注》。本劉申甫（逢祿）《論語述何》之旨，以《公羊》義例，詮發聖言。謂黜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而微言在《論語》，其立意已甚謬。注中傳會牽率迂妄可笑之事，不勝僂指。……望既不識字，妄以《公羊》家最謬之說，強誣古人，此東漢徐防所謂妄生穿鑿、輕侮道術者也。（同治壬申五月十六）

閱《論語正義》。……“殷因於夏禮”節，取戴望附會《公羊》之說。“加我數年”二句，取戴望說。……謂安得數年之暇，用五用十以學《易》，皆曲說支離而謬取之，尤近於侮聖言。（光緒己卯閏三月廿六）

敘述至此，吾人對李慈銘的乾嘉情懷，當有一直觀之認識。對李氏而言，盛世乾嘉的經術文章，是他的精神寄託。他既深憾於此

一美好時代已無法追及,又痛恨使此一淳樸美善之學風一去不返的反漢學言論。所以在強為守衛的同時,也就對這些自外於漢學陣營的學術派別,給予尖銳的反擊。但是他最在意,可以說是耿耿於懷的,就是常州諸子以漢學手段,強解經典的浮誇學風,在《日記》中,有大量的篇幅,對常州之學出以最苛刻的批判與嘲諷。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李氏對其他反漢學陣營的學者,如翁方綱、姚鼐之輩,能漸以平和心態,討論其人其學。惟獨對常州之學的批判,隨著年齡老大而越見辛辣。這樣的心情,若不能將其眼見盛世時光消逝卻無能為力的心情帶進來思考的話,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何他會以極盡難看的字眼,批判他認為導致漢學衰敗的學術流派了。這是當我們要對李慈銘的學術評論進行深入理解之前,必須掌握的認識前提。

## 五、結 論

有學者認為,乾嘉學者把自己當作一個知識人與學問人,而非人倫道德秩序的維護者與解釋者。他們能夠擺脫傳統以一元論的態度看待學問的方式,與倫理劃清界限,讓學問獨立,不再強調學問的功利性,所以乾嘉學術是事實研究而非規範研究。這種把價值判斷摒棄出學術範圍,是一種看似小心翼翼,實則大膽之極的舉動,顯示出乾嘉學術與傳統學術的巨大分野<sup>[71]</sup>。進而認為李慈銘的學術觀對去道德化根本未嘗領會,說他不僅未曾受西學的洗禮,連乾嘉學派的精髓都沒有了解<sup>[72]</sup>。這樣的觀察有是有非,尚待進一步釐清。

其實,從方法學層次上來講,亦即在操作上,乾嘉學術相對於傳統學術而言,確實有事實研究的特徵,但乾嘉學術實事求是這一精神背後,又何嘗不是欲以新的規範替代舊的規範?而新舊規範之間的批評與替代的動作,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化行為。這種意識,始終潛藏在傳統學術內部,每在潮流更替之際,就會

顯現出來。換言之，不論在價值立場上的批判宋學欲以漢學代之，或在方法學場域上的鼓吹訓詁以取代空衍經說，乾嘉學者的學術訴求，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化的舉動。而這種轉移學術風氣的企圖，即筆者所言的經學政治觀。

需要說明的是，從方法學層次來看，李慈銘對乾嘉學術的接受，其實並沒有學者所批評的未曾領會去道德化這一問題。也就是說，去規範化、強調事實研究等一般所謂的乾嘉學術方法之精髓，李慈銘並非未嘗領會，這一點，只要將其《日記》瀏覽一番，就能得到直觀的認識。只是李慈銘對乾嘉學術的接受，除了方法與技術層次之外，還有道德與價值層次，並且二者之間被看重的程度並不相同。換言之，李慈銘對乾嘉學術最根本的訴求，更傾向在道德化這一層次上。當然，若是將李慈銘與乾嘉諸老輩的道德化訴求相比較，大概可以看出乾嘉諸老輩是期待在潤物無聲之間，能達到轉移風氣的效果；而李慈銘則是直接做出強烈的宣示，將乾嘉學術作為批判現實的工具。所以我們纔會在《日記》中不斷地看到，除了站在方法學立場評論乾嘉學術優劣之外，更多的是他把乾嘉學術當作一種盛世的典型，而文字之中，既有典型不再之悵惘，也有想要重拾墜緒，以為針砭時令之用意。這樣的情懷，既非純學術的，也不够客觀，卻不是沒有意義。如稍前筆者所論，將學術與政治乃至對道的追求或世風人心的維護作緊密的聯繫，是傳統關懷現實的讀書人慣有的思維。也惟有將李慈銘的學術關懷代入此一思維之中，李慈銘學術批評的脈絡纔會顯現，也纔能領略到他的許多看似過激的言論，其背後都有一種價值理想與學術關懷作為支撐，而不僅只是作客觀的學術評論而已。

（作者：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注釋：

- [ 1 ] 例如董叢林以徘徊角鬥場來形容李慈銘的參與科舉、官場浮沉,又以徘徊遊戲場來形容李慈銘的流連風月與文墨生涯,可謂虐而又諷。不能說所述非李慈銘之面目,卻也無視李慈銘學術評論當中,所帶有的理想性。另外,王標以《越縵堂日記》為基本材料,通過李慈銘的讀書生活史,考察一個清季知識分子在知識日範的時代,如何通過讀書來進行文化實踐,以冀重建知識的規範。認為從李慈銘的讀書生活中,反映了一種秩序化的要求:由書籍的秩序來改變社會的秩序,由精神構造來改變社會構造。所論可謂有見,可惜限於篇幅,未能深入探討。(董叢林:《論晚清文士李慈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頁16—40;王標:《作為文化實踐的讀書——以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為中心》,《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頁14—21。)
- [ 2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91。按:錢穆批評朱一新、李慈銘、譚獻等兩浙學人為:“抨彈之高,過於建樹;泛濫之廣,勝其持守。徘徊漢宋,出入經史,博而無統,雜而寡要,舊轍已迷,新軫尚遠,終於為一過渡之學者。”這樣的評論,似乎過於形式主義,仍不離章學誠撰述記著的窠臼。若著作必依章實齋、錢穆之標準,則《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談藝錄》之類,或當不得第一流了。更何況李慈銘等人,論學自有關懷之處,不能因為不成系統,而否定其價值。
- [ 3 ]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77。
- [ 4 ] 例如,有學者批評李慈銘對新學、西學全無反應,以為不可思議。說他生當變風、變雅的時代,而仍倒回去作正風、正雅的文章,說這是他詩文不達巔峰之因。李氏的詩學成就,是否因為如此而不達巔峰,尚待討論,然如此批評,預設的卻是傳統學者必須要向前看、向現代化轉進,不如此即為落後的假命題。張寅彭、周容編校:《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前言,頁40。
- [ 5 ]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25。
- [ 6 ]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出版社,1985年),冊220,頁491—492。
- [ 7 ]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56—357。
- [ 8 ] 按:繆荃孫之言,引自鄧雲鄉:《宣南秉燭談·父子翰林》(石家莊: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4年),頁105。

- [ 9 ] 例如託名楊樹達所撰之《葉邨園先生之經學》裏,有評王闓運之文字。其言曰:“湘綺師乃六朝文士,不足當經學大師。”(《文字同盟》第14號,頁189)又例如陳三在《談越縵老人》一文中亦提出強烈質疑,他說:“至《清史稿》之爲老人與湘綺作傳,則置老人於《文苑》,而把湘綺列之《儒林》,其彼此間的分道揚鑣,殆由於老人說經的著作不及湘綺的豐富而然。我們如果據此以論定老人與湘綺學術地位的高下,這就恐怕要‘見仁見智,因人而殊’了。”又查時傑在《從越縵堂日記看晚清的清議》中亦言:“從《日記》中可知,(李氏)平日勤於讀書,偶因患病而身體不適,或因窘迫而生計維艱,依然讀書如故,是真將治學讀書變成興趣嗜好,日日浸淫其中而得其樂。終其一生,其治學讀書,研經治史的興趣,始終不減。慈銘之有日後學術上之成就名聲,非浪得虛名者可比。”收入朱傳譽主編:《李慈銘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頁7、頁18。
- [ 10 ] 紀果庵:《孽海花人物談》,收入曾樸著:《孽海花》(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附錄,頁18。按:曾樸在《孽海花》裏所創造的人物李治民,號純客,即影射其師李慈銘,李字愛伯,號蓴客。
- [ 11 ] 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86,總頁13441。
- [ 12 ] 金梁編:《越縵堂日記索引》(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出版說明”，頁1。
- [ 13 ] [清]李慈銘撰、李文糾輯:《越縵堂詹詹錄》(紹興:紹興印刷局,1933年),卷末,頁65。
- [ 14 ] 王存訓:《徵刊〈越縵堂日記〉啓》,收入《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頁1。
- [ 15 ] 蔡冠洛輯:《乾隆紹興府志校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卷首,頁1。
- [ 16 ] 楊樹達:《李越縵先生諸史劄記序》,收入《越縵堂讀史劄記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5。
- [ 17 ] 同注[16]。
- [ 18 ]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收入《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0。

- [19] [宋]余靖:《孫工部詩集序》,《武溪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真本叢刊·集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5冊,總頁63。
- [20] [清]張之洞:《勸學篇序》,《勸學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1。
- [21] 按:即使從罵人的話裏,也可以看出乾嘉時代在李慈銘心中的分量。如言:“孝達(張之洞)謂趙之謙之荒謬狂鄙,本不值一罵,然其不學無行之詭狀,三尺童子可立發其覆,而士大夫乃為所給,良由實學不明,世無正論。使生乾嘉之代,太陽徧照,妖魅自清,何煩我輩齒頰哉?予甚韙其言。”(同治辛未五月初一)張之洞認為以趙之謙的荒謬狂鄙,士大夫竟為所給,是因實學不明,世無正論之故,因此而懷念起乾嘉時代的學術氛圍來。顯然地,這應是李慈銘借張之洞之口的夫子自道吧!但由此益可知對乾嘉時代風俗純美、學術雅正的追慕,體現的其實是李氏心中整體的文化情懷。
- [22] 李慈銘:《王杏泉墓誌銘》,《越縵堂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966。
- [23]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594。
- [24]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頁76。
- [25] 李慈銘:《復桂浩亭書》,《越縵堂詩文集》,頁837。又李慈銘晚年回憶時仍言:“二十五歲以後,更喜治經為漢學。”(光緒庚寅正月十九)。
- [26] 按李氏言:“見學使告士子文,勸讀經史及王深寧《困學紀聞》、顧寧人《日知錄》、錢辛楣《養新錄》、王伯申《經義述聞》諸書。此輩以數十篇庸爛墨卷,博取科第,乃尚知以古學勉人,亦使老死帖括人知世間尚有絕學也。學使固不知文,此舉差強人意。”(咸豐甲寅三月初七)對於日後擔任嶽麓書院山長、門下弟子數千人的周玉麒,李氏在鄙薄之中,尚存有幾分肯定之意者,在於周氏尚知以古學勉人。但是對這類以八股程藝博取科第的讀書人,青年時代的李慈銘,即已自覺的劃出界限,嘗試走出自己的為學之路。
- [27] 按:院試為生員(秀才)資格考之第三級考試,由學政主持。參與院試之前,需通過縣試、府試兩級預備考試,纔能參與院試考試,通過院試考試,纔有生員資格。科試則為學政考核生員的考試之一,另一種為歲試。歲試為每年舉行,科試則逢鄉舉之年(子、卯、午、酉)舉行。
- [28] 按:吳鍾駿在道光二年(1822)中試壬午科舉人,又為壬辰科恩科狀元。道光

二十四年(1844)在浙江視學時,曾對應試生童提出為學之方六條:“治經商漢學;學者就傅必先討論諸儒說經書;形聲、訓詁為窮經之根柢;馬《記》、班《書》為經傳之羽翼;推之選詞試帖,楷法點畫勿效習尚;勿問俗本。”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經術明,儒業淳,學術正,人才蔚”。

- [29] 按:李氏參加院試考試在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記》補記在咸豐四年三月十四。
- [30] 宋訓倫:《李慈銘及其日記(上)》,收入朱傳譽主編:《李慈銘傳記資料》,頁14。
- [31] 陳淑惠:《李慈銘及其文學批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6年碩士論文),頁28。
- [32]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庚申十月初九。
- [33]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庚申正月十三。按:張舜徽因此諷刺他經學荒蕪,說他“年三十二,始得段注《說文》,他可知矣”。這樣的評論並不公平,因為李慈銘時期的紹興,已不復有乾嘉時期的濃厚學術氛圍,士子求學,又回到科舉老路。李氏能在二十四五歲時遍讀《學海堂經解》,已是不易。更何況他人都以前一樣沒有看過《十駕齋養新錄》,卻無妨於他對史書的閱讀愛好。盧敦基從李氏早期《日記》中歸納出其入都前所讀學術書,即以史部為主;若以內容言,則以名物考訂為主。除了正史之外,單以明清易代之際為例,便讀過《東林本末》、《平蜀紀事》、《榆林城守紀略》、《揚州十日記》等。張舜徽卻諷其早年究心乙部,亦特常窺錢、王、趙三家札記以資口給,顯然與事實有出入。而且,入都前的李慈銘,已流露出重漢輕宋的趨向。李慈銘向往的是遍蒐眾說,客觀論斷。可見清代漢學的考證之風對於而立之年的李慈銘已有深刻影響了。盧敦基:《李慈銘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70—72。
- [34]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己未十二月廿四。
- [35] 盧敦基:《李慈銘研究》,頁74。
- [36] 正如狩野直喜所言:“學政考試的內容不外乎‘經義’,也就是解釋《四書》《五經》之類。答題文章本身相當重要,因為成績的好壞,得根據考生所作文章與詩賦的優劣來判定。但是文章與詩賦的優劣正誤,並不像數理化那樣有客觀的衡量標準,它只能由擔任考官的學政,根據他個人的鑑識趣味來判斷。倘若不合學政的口味,考生的文章無論多麼出色、詩賦多麼優秀,也是

白搭,照樣不予錄取。因此,對於考生來說,搞清楚新任學政的學問門派(如漢學、宋學、金石學、文字學等),及其對詩文的個人愛好,是很重要的一環。習慣上常把學政的工作稱作‘掌文衡’,或稱‘掌文柄’。事實正是如此,學政的學問文章,確實直接影響到所在地區的整個風氣。”這種情況,不只是學政主持的院試、歲試、科試如此,鄉、會試亦有類似情形。問題是,遵守程朱理學的掌文衡者,總是占絕大多數。所以,以古學為治學標的的士子,在科舉上常居劣勢,也是理所當然。這一點,李慈銘在《日記》中多次提到,並深致其憾。狩野直喜:《清朝的科舉制度》,收入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譯:《中國學文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330。

- [37] 李慈銘:《訓導連君傳》,《越縵堂詩文集》,頁937。
- [38] 李慈銘:《與馬穀山中丞箋》,《越縵堂詩文集》,頁1150。
- [39] 李慈銘:《陳德夫墓誌銘》,《越縵堂詩文集》,頁959。
- [40] 李慈銘:《致敖金甫書》,《越縵堂詩文集》,頁843。
- [41] 李慈銘:《上閻丹初尚書書》,《越縵堂詩文集》,頁833。
- [42] 李慈銘:《與顧河之孝廉書》,《越縵堂詩文集》,頁819。
- [43] 南冠:《談李慈銘》,《李慈銘傳記資料》,頁1。
- [44] 李慈銘:《復陳晝卿觀察書》,《越縵堂詩文集》,頁827。
- [45] 相關討論,可參馮天瑜、何曉明著:《張之洞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8—52。
- [46] 王式通:《越縵堂文集跋》,《越縵堂詩文集》,頁1553。
- [47] 其詳可參考朱傳譽主編《李慈銘傳記資料》的眾家評論。
- [48] 王重民:《李越縵先生著述考》,《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6卷第5期,頁1。
- [49] 李慈銘:《與顧河之孝廉書》,《越縵堂詩文集》,頁820。
- [50]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285。
- [51] 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卷1,頁766。
- [52] 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卷1,頁767。
- [53] 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頁832。
- [54] 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頁819。
- [55] 另外,李氏於《詩瀆》之眉批亦言:“《總論》凡兩卷,議論皆平實有據,較後之十八卷為勝。惟必謂《序》非子夏作,蓋吾越學派,不甚信鄭君,故於《序》多



- 依違也。”王利器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頁10。
- [56] 胡培翬：《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胡培翬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頁291。
- [57] 按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有“宋初考古之條學”（頁219）載李氏之言曰：“宋初經學之臣……猶守古學。至歐陽氏以文章名世，而開空疏之習；劉原父以博洽冠時，而啓改亂之弊。自是而降，立異造新，決裂師法，如司馬文正、陳祥道者，中流之一壺矣。”
- [58] 李慈銘：《書沈光祿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越縵堂詩文集》，頁900—901。
- [59] 李慈銘：《致陳德甫書》，《越縵堂詩文集》，頁821。
- [60]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頁78。
- [61] 同前書，頁511。
- [62] 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15。
- [63] 李慈銘言：“北江上疏事，以不喜漢學人議之，必將爲狂，爲好名，爲多事。予初目之曰戇直，繼改曰樸忠，又曰抗激，後直定曰孤忠。蓋北江時已乞假將歸，徒以身侍講幄，深悉親政之始，敬肆所由分，誅奸之後，治亂所從出；而府庫已虧，盜賊四起，大臣雍容，憚於整飭，上下弛緩，責難無聞。故冒死上言，直繩聖德，冀以殺身悟主，朝野震悚，得不謂之孤忠乎？”（同治癸亥十二月十六）
- [64] 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卷485，總頁13395。
- [65]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頁317。
- [66] 〔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1，頁1a，總頁6。
- [67] 按：章學誠曾批評戴震“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此處所言古文，非指古文經學，而是韓、柳古文。他說：“馬、班之史，韓、柳之文，其與於道，猶馬、鄭之訓詁，賈、孔之義疏也。戴氏則謂彼皆藝而非道，此猶資舟楫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其意蓋謂文史之學與經義訓詁皆是通往道之門徑。在章氏看來，求道之路，不僅只在“經傳訓詁”一路，“文史校讎”同樣是通向道的康莊坦途。〔清〕章學誠：《書朱陸篇後》，《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6。

- [68] 按：對於毛奇齡的學術特色，李慈銘有著墨不少，大抵愛其博辨，而不取其武斷。此處援引二例，以見其梗概。如云：“余素喜毛西河氏諸經說，以其筆舌雋利，為經生家獨出，顧武斷處太多。”（咸豐丁巳九月廿八）又云：“閱毛西河《昏禮辨正》……諸書。雖蔑棄先儒，不特掇擊注疏，痛詆朱子，至謂《禮經》由秦漢人掇拾，多不足信，《士禮》亦戰國以後俗儒所為，怪誕不經，其恣悍已甚；然博辨不窮，不可謂非辨才絕出也。”（光緒丁亥十月初五）
- [69] 李慈銘：《與顧河之孝廉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820。
- [70] 有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拙著：《常州莊氏術新論》，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2000 年博士論文，尤其是第五章。
- [71] 盧敦基：《李慈銘研究》，頁 48。
- [72] 同前書，頁 1。

# The Fine Traditions before Sunset: Li Ciming's Attachment to the Qianlong-Jiaqing Era's Scholarship Revealed in His Academic Critiques

**Tsai Ch'ang-li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Li Ciming (1830—1894) won great renown from his *Diary of the Yueman Hall*, which contains a million words of critique on the classics, histories, and intellectuals. In awe of and fearing his learnedness, most scholars of later ages traced the origin of his scholarship through the content of his *Diary*, while others discussed late Qing scholarship based on his comments. These discussions, however, can hardly articulate the ultimate concerns left after Li's critical comments. Through careful analyses of his arguments in the *Diary*, the present essay observes that Li regarded the scholarship of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early 18<sup>th</sup> to early 19<sup>th</sup> centuries) as his model and thereby set his criteria for academic criticism. By praising and criticizing scholars and their works, Li aimed to rectify the deviation in scholarship; rebuild the tradition of Han studies, which had long collapsed; and make a return to the exemplary Qianlong-Jiaqing era in both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This will serve as an example of how traditional scholars endeavored to maintain a fine legacy in scholarship and social customs.

Keywords: Li Ciming, *Diary of the Yueman Hall*, the Han studies of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Values of scholarship